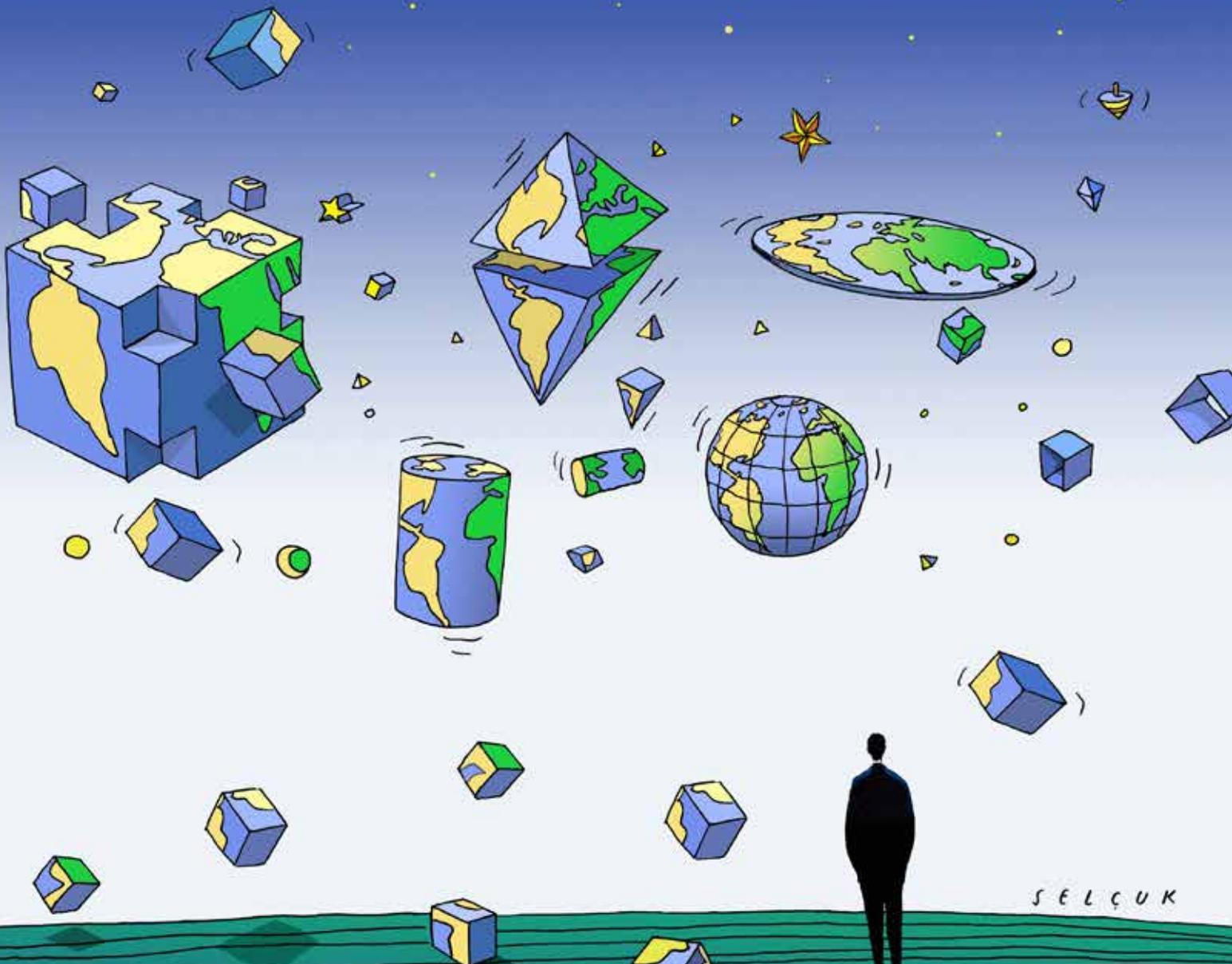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信使



SELÇUK

共同迎接
2030年的挑战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本期作者



本期内容

近70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一直是国际议题的辩论平台。停刊五年后于2017年首度复刊的这一期仍遵循先例，召集世界各地的专家、公众人物、艺术家和记者，共同探讨当今的热门议题。

本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主题可归纳如下：气候变迁与绿色能源（第21页）、城市与“智慧城市”的未来（第13页）、水资源的获取与地下水层的状态（第17页）、教育政策与女童教育（第6页）、新科技及其在建立有效民主体制中扮演的角色（第25页）、建立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第29页）。

教科文组织积极参与制定这一国际行动的路线图，帮助各国在2030年前达成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文化并没有被正式列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本组织坚信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核心（第10页）。

快活的Elyx是法国艺术家亚西那·阿易特·卡西创造的联合国虚拟大使。它将和《信使》一道展现世界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项目的实施情况，并宣传那些推动这一关乎全人类议程实现的参与方和推动者，包括：国际社会、国家、公民社会、地方政府、私营企业以及上述各方之间构成的伙伴关系。

“观点”这个专栏主要呈现现代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观感这一主题，鼓励重读《古兰经》（第41页）和圣训（第46页），并向读者介绍《伊斯兰文化面面观》一书。教科文组织出版机构自1977年开始针对世界通史和区域历史进行研究，这部著作就是在这个浩大研究工程中产生的。这套内容广泛而全面的丛书于2016年11月出版，其中的两卷对当今关于伊斯兰教的辩论有重大贡献。

本期杂志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关于2017年4—6月这个季度的活动，

《信使》将于4月23日于几内亚科纳克里参加“世界图书之都”活动的开幕式（第68页），并在4月30日赴哈瓦那与古巴钢琴家丘乔共同庆祝国际爵士乐日（第56页）。此外，《信使》还将参加其他国际节日的庆祝活动，如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第60页）、6月8日的世界海洋日（第63页）以及6月19日的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第59页）。

最后，这一期《信使》将带您走入韩国济州岛“海女”们独特而鲜为人知的世界，并通过“特写”专栏用引人入胜的图片展现这些奇特女性的传奇人生（第34页）。

祝您阅读愉快。

《信使》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有七种语言版本，季刊，旨在通过分享对国际相关事务的观点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信使》出版做出的慷慨支持。

出版主任	Eric Falt
常务主管	Vincent Defourny
编辑主任	Jasmina Šopova
制作与推广主任	Ian Denison
助理编辑	Katerina Markelova
数字编辑	Malahat Ibrahimova
编辑	
○ 阿拉伯语	Anissa Barrak
○ 汉语	王小梅, 陈艺华
○ 英语	Shiraz Sidhva
○ 法语	Isabelle Motchane-Brun
○ 葡萄牙语	Ana Lúcia Guimarães
○ 俄语	Marina Yaloyan
○ 西班牙语	Lucía Iglesias Kuntz
英语翻译	Olivia Fuller and Beatrix de Koster
图片编辑	Danica Bijeljic
版面设计	Abjad Design

免费在线订阅
<http://zh.unesco.org/courier>

咨询与复制权
courier@unesco.org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France

© UNESCO 2017
ISSN 2220-3575
e-ISSN 2220-3583



本刊经“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国际政府组织 (CC-BY-SA 3.0 IGO)”授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 可开放获取。若引用该期刊内容，需接受并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资料库的使用条款 (<http://en.unesco.org/open-access/>)。

现授权限仅为文字内容，若使用图片，需事先申请许可。

期刊所载内容若涉及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当局的合法地位，以及涉及边界界定，皆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所刊文章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点，本组织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封面图片 ©Selçuk

本期专题

社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3



广角

彭丽媛：“机会平等是根本”	6
雅斯米娜 Jasmina Šopova 担任采访	
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	10
尤缇·奥撒格哈尔 Jyoti Hosagrahar	
“非洲创客”一代	13
阿尤库·门萨 Ayoko Mensah	
吴哥水危机	17
尚伦·索克 Chamroeun Sok	
阿米娜·古里布·法基姆：科学是	
社会进步的基石	21
伊萨贝拉·莫查纳·布兰	
Isabelle Motchane-Brun 采访整理	
爱沙尼亚政府对技术的支持值得各国借鉴	25
玛丽·若娜玛 Mari Roonemaa	
带来变革的创新伙伴关系	29
刁拉兹·西德瓦 Shiraz Sidhva	



影像

海女：济州岛上活着的传奇 35
卡特琳娜·马尔克洛娃 Katerina Markelova



观点

《古兰经》——文本与语境	41
马哈茂德·侯赛因 Mahmoud Hussein	
“沙里亚”不是什么？	46
阿里·本马克洛夫 Ali Benmakhlouf	
我们时代的参考书	48
娜依德·阿弗罗斯·卡比尔 Nahid Afrose Kabir	



嘉宾

阿法迪：让非洲创意获得世界认可 51
雅斯米娜 Jasmina Šopova 担任采访



时事

钢琴家丘乔·巴尔德斯：“我探索每一条可能的道路！”	57
露西亚 Lucia Iglesias Kuntz 担任采访	
看，我多美！	59
在线培训法官，保护新闻记者	60
罗森塔尔·卡尔蒙·阿尔维斯	
Rosental Calmon Alves	
探索海底深处的奥秘	63
谷伸 Shin Tani	
从“圣经陈列柜”到真正的“书柜”	68
库曼提奥·泽纳布·迪亚洛	
Koumanthio Zeinab Diallo	



新闻

体育促进和平	70
打击和预防青年激进化	70
信息扫盲 点击智慧	71
大熊湖人的来访	72
开放式教育资源取得新进展	72

社论



「轮转」— 约旦, 安曼 2016 © Pejac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自1948年创刊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一直坚持在全球广泛传播一个理想，即：以普世价值和基本人权为核心，以多元的文化、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成就为纽带，将人类的多样性紧紧地团结起来。

《信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科文组织践行自己人文使命的重要工具之一。《信使》的创办者及首任主编桑迪·克夫勒在1988年曾表示：“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出版的所有期刊中，就读者数量和受众广度而言，《信使》一直是稳居榜首的。”近70年来，《信使》在所有五大洲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命的化身：通过知识和文化的传播，通过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自由交流思想和信息，“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帮助加强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培养宽容的精神、鼓励有依据的辩论、促进和平。2017年，这本杂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慷慨支持下恢复发行，这一珍贵的机会不仅意味着编辑工作的恢复，更意味着我们得以再次弘扬《信使》创刊时的根本价值观。

《信使》的再版发行可谓恰逢其时：联合国2015年9月采纳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议程的采纳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全球

发展政策开始向更加人本主义的态度转变，更强调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来提升人的能力，应对和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而这也是构成每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本要素。

我们坚信，在一个无论资源还是智力都有限的世界里，智慧、创造力和独创性是我们人类可以依赖的可再生资源，只要我们以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和尊严的道德信念滋养它，这一财富就会成为永不枯竭的进步之源。为了全面释放这种潜力，我们必须提高对人类创造力财富的认识，而《信使》将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它将传播和平、信任和智慧的语言，以此回应那些在互联网和大街小巷肆意传播的仇恨、恐惧和排斥的言论。《信使》将是实现这一根本愿望的有力工具，我在此呼吁：欢迎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员国及其合作伙伴，特别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专家来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一起来丰富充实这本已经激励了、并将继续激励数代读者的杂志。■

伊琳娜·博科娃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éducation,
la science et la culture

OBJECTIF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YAK

ELYX
BY
YAK

共同迎接 2030年的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于2015年9月通过了一项崭新的全球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于2030年之前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

“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包括17个宏伟目标，它们相互依存，以包容、融合、普世为核心理念，以根除贫穷、保护地球、确保全民繁荣为共同目标，是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公民社会乃至每个公民都可以遵循的指南。

作为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的积极参与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中九个目标将做出特别的贡献，它在这九个目标所涉及的领域中具有公认的专长和领导地位。虽然没有任何目标与文化直接相连，但文化的作用被视为履行整个全球议程的关键因素。

在消除贫穷（目标1）和缩减不平等（目标10）的背景下，教科文组织以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来实现所有发展目标（目标17）为基点，主要负责协调《教育2030议程》。这一议程的宗旨是发展公平和包容的优质教育，扩大全民享有终身教育的机会（目标4）。

通过落实这些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加大力度提倡性别平等，并在获取教育、参与决策（特别是在科学界）、成为变革社会的行动者，以及

反对虐待女性方面赋权妇女和女童（目标5）。

通过水资源管理和科学与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研究项目，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改善饮用水的安全使用（目标6），参与确认科学、科技和创新（目标9）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里的作用。教科文组织还推广海洋学知识，参与提高海洋和海岸的可持续管理能力（目标14）。教科文组织通过建立世界遗产和生物圈保护区来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自然资源的管理（目标15），并且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目标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参与建立包容、安全和抗逆的城市，特别注重保护人类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目标11）。此外，本组织还致力于公开信息，呼吁保障记者安全，以及倡导善治和法制的理念（目标16）。▣



彭丽媛：“机会平等是根本”

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支持国际发展层面，中国都高度重视全民教育。在入学机会、学校待遇、成人教育、就业引导等方面，保障性别平等是中国第一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女士心中的坚定信念，此外，彭女士本人也是一位教授。

采访者
雅斯米娜 Jasmina Šopova

您在推动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广泛赞誉。您何时开始关注教育领域性别平等问题？最初是什么个人原因让您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

我从事教育工作受我父亲影响很大。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农村教育条件非常薄弱，很多人特别是妇女不识字。我父亲是村夜校的校长，负责扫盲工作。他对这份工作很热心、很投入。在他的帮助下，很多人第一次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第一次读懂了报纸和书刊。特别是一些母亲识字之后，把自己学会的字教给她们的儿女。我从小受到他的影响，长大以后，做了教师、做了母亲，体会更深了。

性别不平等是全球根深蒂固的顽疾，很多地方的女性仍然是弱势群体，占全球贫困人口70%；世界成人文盲中近三分之二是女性；全球失学儿童中女童超过一半；很多妇女往往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饱尝生活艰辛。女性最渴望平等和尊重，因此，我很愿意为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做些工作。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您认为首要工作是什么？要确保女童享有与男童同样

的个人发展机会，您认为我们需要在教育领域做出的最重要改变是什么？

女童和妇女教育是一项很崇高也很重要的事业。2014年3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我从博科娃总干事手中接过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证书时，既深感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促进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实现自身发展潜力的机会，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性别平等、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教育公平包括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三个方面，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让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就学机会；在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平等对待，得到同等升学、同等就业的机会以及同等的社会认可度。我愿意尽我所能，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份贡献。

作为教科文组织特使，您能否举例说说您是如何推动提高女童和妇女权利的？您常常在出访中访问学校，您希望向师生传递什么信息？

担任教科文组织特使两年多来，我访问了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学校、青少年机构、妇女发展机构，希望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从他们那里



北京，2016年6月6日，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上，来自津巴布韦和印度尼西亚的获奖者代表从总干事博科娃和彭丽媛夫人手中接过获奖证书。

吸取智慧和力量，与他们分享经验。我在有关活动中，经常呼吁人们要认识女教师的重要性，认识发展女童和妇女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在联合国举行的“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上，我就呼吁各国应该更加重视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在中国，有一个叫“春蕾计划”的女童助学公益项目，自1989年启动以来，这项计划已经资助女童342万人次，捐建春蕾学校1489所，对适龄女童进行实用技术培训52.3万人次，编写发放护蕾手册150万套。我作为春蕾计划促进女童教育特使，

走访过女童夏令营，看到曾经失学的女童们多才多艺、快乐成长，感到十分欣慰。

我想告诉人们，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有意义生活的基础，也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只要有为梦想奋斗的勇气和毅力，每个女童、每个女性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中国政府出资设立了女童和妇女教育奖。2016年，您和总干事在北京为首届获奖者颁奖，能谈谈您对她

们的印象吗？您认为这个奖对于提升全球对女童和妇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有什么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提议并资助的“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一领域设立的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奖项，目的是通过奖励为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鼓励更多人投身这项事业。2016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颁奖仪式上，我见到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的获奖者，她们以及她们代表的机构为促进女性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

事情，非常令人敬佩。正是因为有了她们，有了很多像她们一样甘于奉献、不懈努力的人们，我们的世界才变得更加温暖。我要对她们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您本人也是一名教师。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两段最贴近您内心的经历？您认为教师最需要哪些支持？

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中国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曾将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一位好的教师，对学生而言，就好像他们人生的引路人，既教授知识、启迪智慧，又传递思想、激发热情；对社会而言，就好像他们心田的播种人，在学生心里播下善良、正义、和平的种子。我认为，一名好教师，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永葆创新的动力、活力和能力，促进自身能力提升；要善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用艺术的力量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要心怀尊重、包容理解，在言传身教中培养学生善良、宽容、接纳的品性，为将来服务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大力倡导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您认为中国教育政策的哪些方面最重要？

在中国，促进教育公平、让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中国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困难学生进行资助、提供营养餐等多种方式，保障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利。中国颁布了《中国全民教育行动计划（2001—2015）》，每年对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全民教育监测。每五年颁布一次《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确定了到2020年保障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等领域享有平等权利的目标和措施，提出教育工作要全面贯彻性

别平等原则，保障女童和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教育性别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广大女性把握自身命运、参与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

同时，中国积极扩大教育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表示，将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中国还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基金、奖项等多种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扫盲、教师培训，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

我将履行好特使职责，支持教科文组织促进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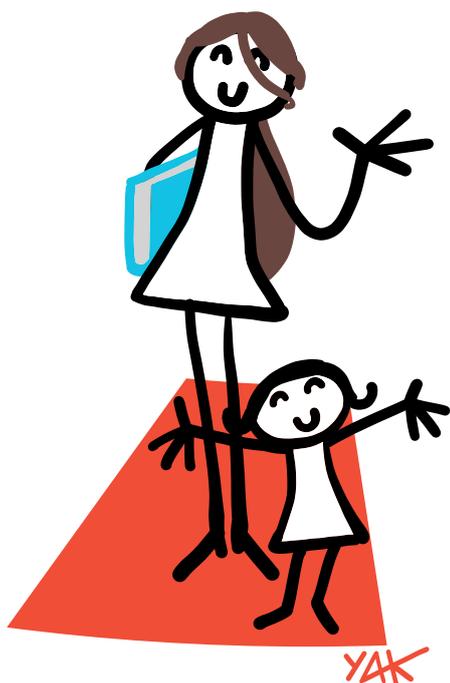
女童教育奖

全民教育和性别平等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尽管过去 20 年来在这两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男童相比，在很多情况下女童仍然处于劣势。贫穷、地理隔离、残疾、早婚或某些地区的固有偏见等，依然是横亘在女童求学之路上的障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于 2015 年在中国政府的赞助下，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表彰在推广和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中勇于创新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和团体。此后每一年，由国际专家评审团选出的两位获奖者可以分别获取 50,000 美元的奖金，用来继续推广女童和妇女教育。

第一届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于 2016 年 6 月在北京颁发，获奖者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儿童早期教育理事会和津巴布韦的“女学生网络信托”，两项计划都是因其创新性而获奖的。

这个奖的设立旨在推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教育和性别平等发展目标，同时也展现出中国高度重视通过制定法律、政策和国际合作保护弱势群体和女童及妇女的权利，关注保障她们的独立性和提升她们的生活质量。■



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

文化塑造了我们的身份，也代表着我们。唯有将文化置于发展政策的核心，才能确保以人为本，包容且公平的发展。

尤缇·奥撒格哈尔
Jyoti Hosagrahar

在联合国于 2015 年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里，文化首度在国际发展议程中被提及。教科文组织将此举誉为对文化的“空前重视”。

文化的保护和推广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同时它也能够直接促进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例如安全并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体面的工作、经济的发展、不平等情况的减少、环境保护、性别愈加平等及和谐且包容的社会。通过以文化视角去有效实现发展目标，将带来间接的文化收益。

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一个超越经济发展的思维观念的转变，预见到的是一个公正、包容、和平且具生态可持续性的未来。这个大胆梦想的实现有赖于创新的发展途径，以跳脱近几十年来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线性发展模式，或各部门独立的发展方式。

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和创造力都是需要受保护和用心管理的资源。如果以文化为优先的举措能够成功介入，那么，创造力和文化对于这些目标的实现便具有驱动和赋能的作用。

包容性城市

对于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 and 人类住区，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目标 11.4 呼吁“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在 2015 年正式开始上述工作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开始朝这个目标迈进。从 2013 年 5 月联合国于中国杭州举办的国际大会上采纳“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核心”的《杭州宣言》到 2015 年 12 月所采纳的“杭州成果”，教科文组织持续重视以人为本的城市，并推动《联合国新城市议程》的发展。

这一议程于 2016 年 10 月在厄瓜多尔基多召开的“人居三”会议中，由全体与会国正式采纳。此议程旨在改造世界上的城市，并提供了未来 20 年发展蓝图，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南。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发布了《文化：城市未来》全球报告，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城市遗产保护、保存和管理情况，以及文化和创意产业的推广。

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就是一个成功案例，通过对荒废或遭破坏的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使当地居民受益。Khan Al Wakala 城古老的沙漠客栈被改造成可举办大型事件文化活动的多用途公共空间。这些努力为当地社区带去活力，有力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增长。通过将分散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联合起来去开发某一个项目，可以有效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目标17：重振全球伙伴关系，谋求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产业，无论是在某个国家里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而文化旅游则占全球旅游营收的40%。这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妥善管理的文化遗产对旅游投资相当具有吸引力，并能在不破坏遗产地区的情况下让当地民众共同参与。

文化促进多样性

创意产业和文化基础建设是创造生计的珍贵资源，尤其是那些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从事这个产业的人中相当高的比例是女性。（目标5：性别平等）。

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能够刺激当地和全国的市场，从而增加“体面工作”（目标8.3和8.5）的机会，提升当地的生产力。对本地产品在贸易上的优惠政策有助于减少国家内和国际间的不平等现象（目

标10）。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普拉塔剧院就是一个例证。这家剧院在国际文化多样性基金（IFCD）的赞助下向610名无业青年和成人提供职业训练，教给他们舞台管理和其他有关表演艺术的技能，旨在帮助学生增强技能，以利就业或创业。

对于企业来说，文化遗产丰富和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地区比较具有吸引力。通过增设文化和创意产业的职位，推动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成长，有助于实现体面工作的发展目标。部分城市的经济相当倚赖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手工艺、音乐、舞蹈、视觉艺术、传统料理和戏剧，这些常是历史城区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层面。▶

稍纵即逝又永垂不朽的艺术



© REZA / Webistan

音乐之城

麦德林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一员。这个城市展现了如何通过文化、教育和创新，用音乐为城市注入活力。除了推动公民文化、社会公正及和平（特别针对当地青年）外，这个城市还通过举办多种音乐活动和受欢迎的音乐集市，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并创造收益和就业机会。

要实现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目标4：素质教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定符合当地社群文化脉络和特色的达标途径。目标4.7 特别提到了文化，并呼吁教育提倡和平和非暴力的文化，以及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此外，提倡基于人权的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能促进文化相互理解与和平（目标 16：和平、正义与强大的制度）、预防冲突和保护边缘化群体的权益。近期发生的某些事件显示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文化

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和气候行动（目标13）间也存有明显关联。许多传统职业和工艺的发展，都需凭借当地生态系统管理、自然资源开采和当地物质材料等方面的知识。由于其中许多产业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能源和投资，文化就能够帮助创造可持续生计，并推动发展绿色经济。

知识体系

在乌干达，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培训了手工艺者（特别是青年）制作“树皮衣”的古老技艺。而在利用这些由于战乱而被忽视的、土生土长的、无所不在的 Mutuba 榕树时，这个培训计划同样制定了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举措。这项计划除了保护树皮衣编织这项非物质资产外，也推动了当地的环境目标发展，并保障了居民的收入。

本地和本土知识体系以及环境管理方法为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态挑战，预防生物多样性丧失、缓和土壤退化并减轻气候变化的效应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文化，尤其是传统知识，也能帮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开展灾后复原（目标13.1）。

尽管《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多次提及文化，却不够重视文化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确切角色的研究需要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并易于评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建立一个系统化且可测量的证据基础，用以展现文化对可持续发展起到的各种作用。□

印度籍的尤缇·奥撒格哈尔 Jyoti Hosagrahar 是一名建筑师、计划者和文化专家。目前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部主任，职责包含监督将文化纳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在进入本组织以前，她曾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印度班加罗尔 Srishti 学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教授。



“非洲创客”一代

初创企业孵化器、创客实验室、数字网站与服务、参与式工作室——非洲的年轻人已经大踏步迈进数字化时代，进入了智能型城市时期。凭借互联网，非洲企业家与艺术家正在以创意和文化产业为发展杠杆进行组织、创新和投资。

阿尤库·门萨
Ayoko Mensah

从达喀尔到内罗毕，青年是非洲大陆新兴数字革命的核心力量：从初创企业孵化器、创客实验室，到网站与网络服务和新合作工作室——投身到这一全新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人数正在不断壮大，他们技术娴熟、在互联网上广泛连通、不仅拥有高学历，而且创造力强。

人们乐于称这些年轻人为“非洲创客 (Afropreneurs)”。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基因”：那就是他们都有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地方和全球连接在一起，以此为改善整个非洲的生活条件做出贡献的强烈愿望。

2010年在达喀尔创办“有客实验室”的卡里姆·西无疑是这些年轻企业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他组建的非营利性组织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以企业家社团及创新中心网络为基础来促进社会变革的虚拟集群”。值得注意的还有塞内加尔首都的第一个最大的文化门户网站——初创的“Agendakar”；以及青年企业家乌萨努·哈迪姆·贝耶，他设计了一套名为“穿越达喀尔城”的智能手机游戏，这款游戏的目的是提醒大众关注传统古兰经学校里大批学童的不幸命运，这些受到剥削的学童在达喀尔城内各处沿街乞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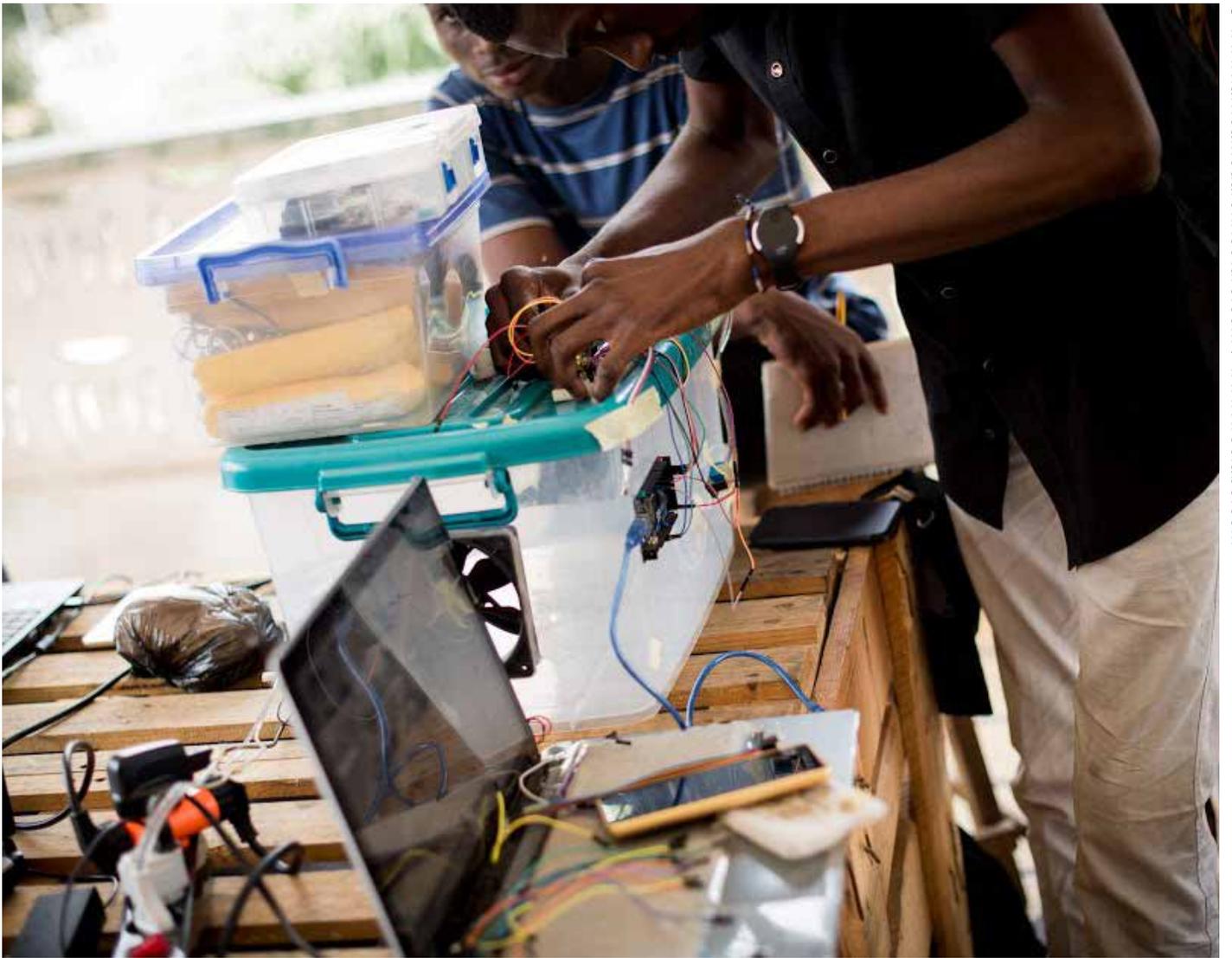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承担着文化及创意产业领域创新重任的年轻人将是塞内加尔境内首座未来智能化城市加姆尼亚久 (Diamniadio) 的建设者。这座智能化城市距塞内加尔首都仅 30 公里，将在最近几年内建设完工。

从智能化城市到本土城市

但加姆尼亚久并不是非洲大陆上仅有的智能化城市。作为新兴数字革命的见证，其他类似的城市规划或卓越数字中心计划也在许多非洲国家迅速展开。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郊区的“雅巴空谷”已经成为非洲最著名的数字中心；肯尼亚的孔扎技术城则聚集了250多家初创企业，被称为“非洲硅谷萨凡纳”。在贝宁，类似的贝宁智能型城市规划正在开发之中；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正在实施智能城市群 E-城市计划；卢旺达和南非也在积极发展相关规划。

如果说这些新城市中心的发展无疑为非洲青年就业打开了新的前景，那么它们也同样引发了一些问题。塞纳梅·科菲·阿格波基努是多哥一位独立的建筑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于2010年创办了“非洲建筑”平台。在他看来，非洲智能型城市不应当照搬西方





“2017多哥瓦资黑克”计划使项目开发者得以通过物联网云集一堂。

的样板，而应该立足本地特点，创造属于自己的模式，就是他所说的“扎根本土的现代性”，这也正是他在多哥首都洛美的一个区域竭力发展的理念。在那里，他创建了一个名为“Woelab”的“硅谷村”，这是“非洲的首个技术民主空间”，目的是建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高档实验室”，让当地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高新技术。

“低高科技”理论的创始人 S·K·阿格波基努表示，“我们应当超越智能型城市，建设明日的本土之城，共享之城”。“低高科技”是一个体现数

字化民主和集体智慧的概念，使低收入者也能接触技术，目的是赋予小区居民获得自主的能力。他告诉《福布斯》杂志（非洲版）“在非洲，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将设计师、程序员、泥瓦工、木工、时装设计师甚至无家可归者聚集在同一地点实施共同计划的平台。”作为一个初创企业孵化器，一个面向所有人定期举办参与型工作室的培训空间，沃俄实验室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讨论和关注。尤其是团队里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还取得了一项技术突破——他用电子垃圾发明了一个叫 W.Afate 的 3D 打印机。

具有强烈社会特征的文化和艺术项目

与日益涌现的非洲创客相比，非洲年轻艺术家及文化工作者们四射的朝气和创造力也颇为引人注目。他们不顾环境的艰难和资源的匮乏，活跃在非洲的各个城市里，表达着自己的愿望；他们试图以自己的艺术为生，改变着自己生活的城市。在布拉柴维尔、金沙萨、卢本巴希、杜阿拉、塞古还有恩贾梅纳等城市，一些机构正在开发结合了艺术手段和社会影响的示范计划。

创意城市的网络

从开普敦、达喀尔、普拉亚、约翰内斯堡、到瓦加杜古、金沙萨和布拉柴维尔，很多城市都把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本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媒介，但尽管如此，创意城市的概念在非洲还是相对较新的。比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创办的创意城市网络中，非洲城市所占的比重很小。在遍布全球54个国家的116座创意城市中，非洲只占4席（分别是2012年入选的布拉柴维尔、2014年入选的达喀尔以及2015年入选的金沙萨和卢本巴希）。

达喀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数字艺术之城”，市长哈里发·萨尔 Khalifa Sall 认为这一命名向投资者、政治决策者和达喀尔的年轻企业家们传递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而后者早在城市获得这一命名之前，就已经投身于数字经济及文化和创意产业中了。

例如，布拉柴维尔雕塑家比尔·库艾拉尼创办的“沙姆工作室”专为新一代才华出众的艺术家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够崭露头角。截至2015年，这个工作室已经举办了四届卢本巴希双年展，赢得了国际上的声誉。而在传统的音乐之都金沙萨，越来越多的艺术节突显出这座城市异乎寻常的文化宝藏。

在达喀尔，除了著名的非洲当代艺术双年展达喀尔艺展 (Dak'Art) 外，科尔·提奥桑协会组织的“非洲像素 (Afropixel) 艺术节也是激情四射，已经成为一个展示众多项目、活动、辩论、艺术和社会思考与实验的平台。科尔·提奥桑协会力图探索新技术在构想及推动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本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潜力，探索一座富有创造性的非洲城市可能展现出的特点。因此他们把2016年第五届艺术节的主题定为“共同的城市”，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下是一份激动人心的节目单，包括：艺术村、创客实验室中的公众工作室、展览、公共艺术装置、光雕投影和关于艺术节主题的参与式交流等。

过去十年来，整个非洲大陆与嘻哈音乐相关的活动此起彼伏，这个领域内的制作人、艺术家和艺术节已经慢慢组建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今天，这个网络正成为一股具有象征意义的力量，推动着艺术合作、团结互助和社会转型。除此之外，说唱歌手们还非常积极地参与公民运动或社会抗议运动，如塞内加尔的音乐组合“受够了”运动、布基纳法索的“扫帚公民”的政治草根运动，还有乍得的“依伊娜”（我们累了）运动等。

2016年5月，布基纳法索说唱歌手、活动人士、“扫帚公民”运动的

领导人之一斯莫奇成了获得素有威望的“流亡音乐奖” (Music in Exile Fund Fellowship award) 旨在奖励世界各地那些通过艺术为自由做出贡献的人，然而不幸的是，获奖两个月后，这位音乐家设在瓦加杜古的音乐工作室就因为突遭火灾而化为乌有。为帮助他重建音乐工作室，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筹款活动随即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展开……

不难看出，非洲的年轻艺术家和文化企业家不仅富有创造性，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活动，而且还决心尽最大努力开发数字工具的潜力，利用其巨大的资源来建设他们梦想中的未来。▣

阿尤库·茹迪特·门萨 Ayoko Judith Mensah，法国-多哥记者、顾问。她创办了《非洲镜像》(Afriscopes) 杂志并担任主编，后以专家的身份到布鲁塞尔为欧盟支持非加太文化部门的“非加太文化+” (Apccultures+) 项目工作，目前担任布鲁塞尔美术馆非洲部的顾问。





“城市诸事”是意大利造型艺术家蒂斯纳·曼弗雷德和刚果编舞安德烈亚·乌安巴合作的一部精彩舞蹈视频，体现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关系（2016年达喀尔双年展）。

城市未来的愿景

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意味着城市将要面临污染、居住、经济发展、贫困、资源和能源管理等诸多重大挑战。

在2015年发起的“文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倡议框架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份题为《文化：城市未来》的全球报告。报告在九个区域伙伴及其各自的网络、专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完成，它建议再重新思

考如何应对影响城市的变化因素，研究文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分析在不同地方背景之下出现的各种趋势、威胁和前景。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1条的宝贵工具。¹

¹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1条的宗旨是“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

吴哥水危机

吴哥建筑群与它所在的暹粒市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成为受害者吗？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吴哥的水资源愈加匮乏，政府不得不采集地下水以满足需求，结果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不仅威胁到当地的陆地生态系统，也让这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文化遗址面临地表沉降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会同国际专家及当地政府协商研究从洞里萨湖生物圈保护区引入水，确保这一地区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进而阻止吴哥窟所在地地表的沉降。

尚伦·索克

Chamroeun Sok

吴哥窟占地四百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寺庙建筑群及古迹遗址之一，位于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名录的吴哥考古公园中心地带。大约25年前，这里向公众开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仅去年一年这座无与伦比的中世纪遗址就接待了400多万名游客，其中250万是外国游客，这对这一地区原本就稀少的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包括112座村庄和成片森林的吴哥建筑群以及附近因旅游业兴旺发展而崛起的城市暹粒，都有可能因为自身的成功而成为受害者。

这里人口已经突破100万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络绎不绝的游客刺激着这里经济的增长，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座曾经沉睡的边远省城变成了一座繁华的都市。现在这里不仅有一座国际机场和100多家酒店，还有数不清的餐馆、咖啡馆、市场和商店，但是这里为五星级度假村前绿油油的草坪、华丽奢侈的新建筑以及顶级高尔夫球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



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使荔枝山国家公园的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2014年摄于柬埔寨暹粒省。

© Erika Pineros



过低的地下水位

暹粒省每年缺水高达约 3 亿立方米。为了弥补无节制的增长，满足由此引发的用水需求，暹粒水务部门每天要抽取大约 27,900 立方地下水供民用。全城很多酒店和其他商业企业为了满足自己的用水需求都在私自非法钻井抽水，这些都严重威胁着这里的地下水水位。

地表沉降，或者说土地表面的下降，有可能对这个千年来历经自然灾害和战乱冲突而幸存下来的寺庙群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抽取地下水是人类活动造成地表沉降的常见原因，而地表沉降是不可逆的，即使重新注入地下水也不可能恢复。虽然吴哥窟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地表沉降，所以在这方面也没有做过具体研究，但是有一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危及这一世界遗产地。旅游业收入占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在长达 30 年的冲突之后，旅游业在这 20 年的和平时期为减除贫困做出了贡献。虽然柬埔寨王国政府一直试图减少这一地区的人口，但

是要限制附近地区的村民从暹粒省与旅游相关的就业中获益是行不通的。

既要充分满足这一地区的用水需求，又要保证吴哥窟寺庙群的稳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两个机构展开了合作，它们分别是：保护和开发吴哥窟历史遗迹国际协调委员会 (CIC - Angkor) ——这是一个集中了不同领域技术专家的论坛；吴哥与暹粒遗址保护和地区整治政府部门 (APSARA) ——这是一个负责公园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这些合作方为保护这项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工作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利用洞里萨湖的水资源

解决水资源匮乏的一个可行办法是从附近洞里萨生物圈保护区的洞里萨湖抽水。在柬语里“洞里萨”的意思是“巨大的湖”，它是东南亚面积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吴哥窟巴戎寺 (Bayon) 的浮雕就描绘了这一地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洞里萨的许多植物被柬埔寨人用于祭祀或药用，大约两百万柬埔寨人以湖区的淡水渔业为生——这里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淡水湖之一，年均捕鱼量超过 25 万公吨。

在批准向暹粒调水的项目之前，柬埔寨政府必须就这一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出评估，因为这片生物圈保护区是洞里萨河的发源地，也是流经东南亚五国的湄公河的洪水调节器，所以对柬埔寨乃至周边各国都意义重大。每年雨季的时候，湄公河涨水后，多余的水会流入洞里萨河，受此影响，洞里萨河的河水就会被迫流回洞里萨湖，与旱季时洞里萨湖的湖水流入洞里萨河的方向正好相反，这使湄公河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条每年两次反向流动的大河。每年的回流可以让湖里的水深从 1 到 1.5 米上升至 8 到 10 米，湖面也会扩大五倍，形成滩地。

这里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保护区之一，自 1999 年以来繁殖复兴了



每年有 250 万 - 300 万游客参观吴哥窟。

数种濒危的鸟类，洞里萨湖及其滩地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命名的生物圈保护区。

年增速高达 20% 的旅游业发展也加剧了环境污染。尽管很大一部分寺庙群会在举办仪式时得到清扫，但垃圾的管理状况一直堪忧。垃圾成堆在暹粒司空见惯，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会随意把垃圾直接扔进河里。沿岸的居民一直在抱怨河水已经脏得无法取用或洗澡了，他们说十二年前水还非常干净，可以直接取来家用，但现在河水却变得又脏又臭。

尽管吴哥窟东北四十公里处的荔枝山没有受到每天成群结队出入寺庙的游客的骚扰，但山上茂密的树林却饱受乱砍滥伐的困扰。位于河谷上游的这座山是流入洞里萨湖的暹粒河的水源地之一，非法采伐和滥种腰果树与豆类等经济作物破坏了这里整个生态系统的水文状况，影响了渔业的产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起了一个“改善与恢复吴哥世界遗产地和暹粒市水利系统”的试点项目，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角度提出各类解决方案，促进实现这一流域社会—环境互动的可持续转型。在试点地区、国家、区域和社区层面的合作互动、学习联盟、和定向介入能力建设，以此强化政策、立法和制度框架。

一项联合计划

这项研究还包括一个关注水资源的运动，意在提升暹粒居民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地下水位下降会对吴哥窟产生的影响以及乱砍滥伐会对洞里萨湖生物圈保护区造成的后果。因为只有当政府部门、利益攸关方及当地居民真正开始合作时，暹粒省水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成为可能，例如，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它颁布的禁止砍伐荔枝山树林的禁令。

要解决水资源管理的关键问题，就必须有抽水率、地下水位及补给率等基础信息的准确数据，并且可以在相关的地区和国家机构之间分

享这些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制订出基于预测的水资源管理规划。抽取地下水的行为应该有助于准确判断对地下水的需求，而且吴哥窟周围应该设立一个地下水位监测系统，这样就能在地下水位过低时向泵站和私人用户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暂停抽水，让地下水得到补给。

振兴古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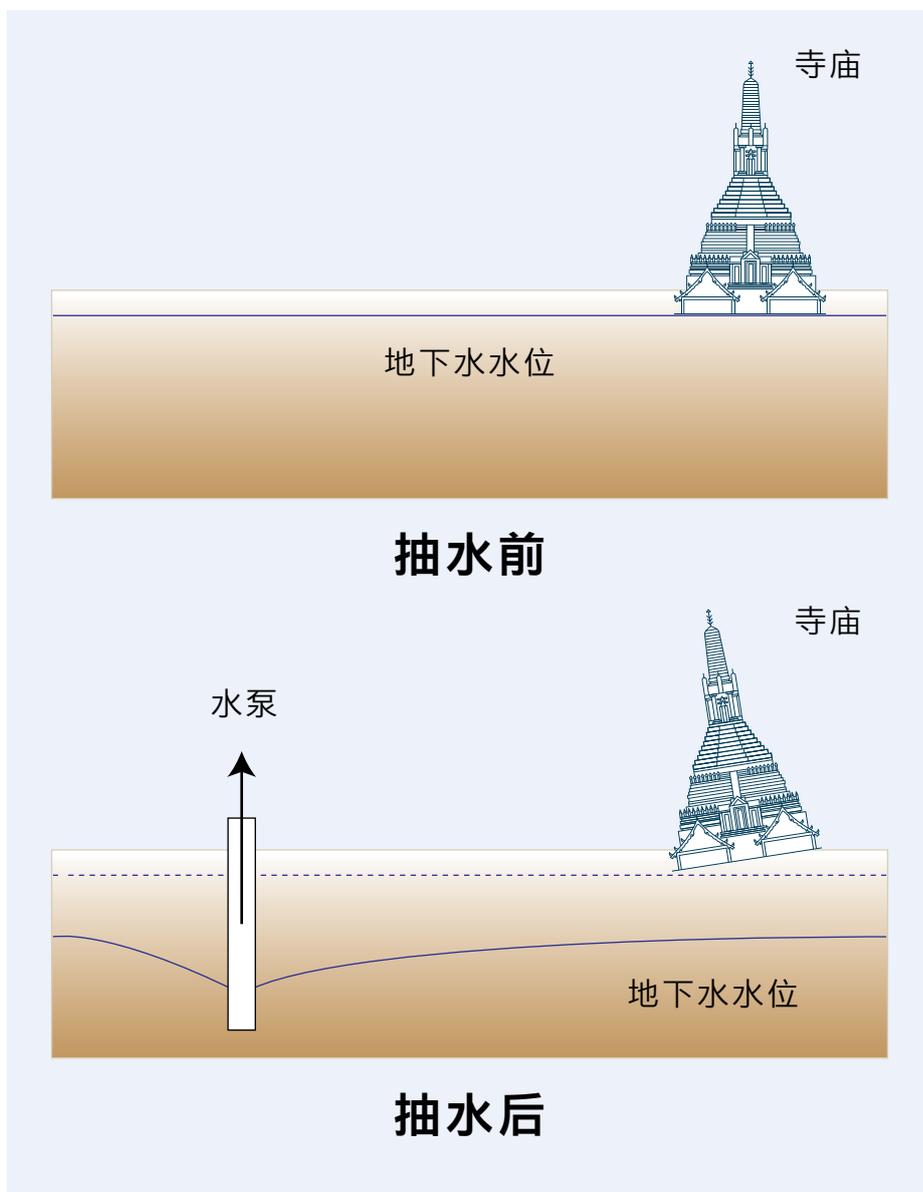
首先要做的是教育人们不要再把垃圾随便扔进河道，同时发起倡议治理暹粒河，使它将来可以成为旅游胜地和地表水供应源。此外，进一步修复吴哥周边更多的寺庙，可以减少主要遗址的客流，从而达到保护吴哥窟的目的。

最近的研究显示，一千多年前建造了吴哥窟的高棉人是水利工程大师。当时的统治者——就像现代城市的管理者——既要保护居民在雨季不受洪水侵害，又要在旱季为家庭及农业用水提供水源，所以就建造了一套支撑这一文明长达六世纪之久的水利系统。这一复杂的水利系统包括收集和分流雨水的人工

池塘和水渠、用于储备灌溉用水的“baray”（蓄水库）、还有红土砌成的水池、护城河、桥梁和堤坝等。

在八年多的时间里，吴哥与暹粒遗址保护和地区整治政府部门（APSARA）的水资源管理局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为复兴吴哥古老的水利系统做准备。例如，环绕着吴哥城及吴哥窟的护城河在干涸了数个世纪之后终于得到整修，河道中再次注满了水。 □

尚伦·索克 Chamreoun Sok，
(大韩民国及柬埔寨)，自由职业资
询师。2013年毕业于韩国仁济大学，
土木及环境工程专业博士，主要
从事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
2015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教科文组织
金边办事处业务顾问。



阿米娜·古里布-法基姆： 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进一步加剧，我们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鼓励研究和创新，并进一步加大对非洲研究人员的支持。毛里求斯总统、女科学家阿米娜·古里布-法基姆 Ameenah Gurib-Fakim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这样说。

伊萨贝拉·莫查纳-布兰
Isabelle Motchane-Brun 采访整理

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人口、生态和技术变革，科学技术和创新该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呢？

科学技术和创新一直都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基础。随着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90 亿居民——人类需要更充分地利用科技工具，以便能用更少的资源在环境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情况下确保食品安全，并保障水与能源的供应。

2017 年 1 月，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介绍了非洲研究创新与创业联盟 (CARIE)，请问这个联盟的宗旨是什么？

非洲研究创新与创业联盟是一个由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维康信托基金会、非洲发展新伙伴 (NEPAD)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众多合作伙伴组成的协会，这些成员决定要联手推动非洲大陆的研究和创新。联盟的宗旨是提高非洲研究人员的技能，并帮助他们改善

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非洲科研人员在研究领域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研究成果的影响还相对有限，并且也不太为人所知。

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人员常常缺少足够的经费来把他们的成果转化产品，或者利用这些成果去创业，而且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也还并不完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被埋在抽屉里，就是在获得专利保护之前就被发表在期刊上公之于众了。联盟的目标就是参与到不同的领域，为研究人员提供资金和手段，帮助他们用科研成果改变非洲人的日常生活。 ▶



“联盟”这个词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不是科学术语，难道科学的发展首先是一个政治斗争吗？

“政治”渗透在各个层面。很显然，如果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在政治上做出好的决定，那么就会对科学研究机构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有当决策者认识到投资科学的重要性时，非洲才能在科学领域取得进步。所以不要孤立地看“联盟”这个词，而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联合各种力量推动非洲科学进步、为非洲人民造福的手段。

这个联盟同由非洲科学院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共同创立的非洲卓越科学加速联盟（AESAs）有什么不同？

与其说有什么不同，不如说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非洲卓越科学加速联盟的工作集中在健康领域，主要受益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维康信托等机构的支持。

目标类似的组织越来越多，这样会不会导致重复运作和资金稀释？

所有这些组织其实都是互补的，所以不存在重复运作的问题。

要知道，非洲的需求非常大，而且已经落后了很多，所以不存在资金被“稀释”的风险。我们必须支持所有旨在培育资源和发展研究的倡议行动。

我想说明的是，非洲还需要再增加几百万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才能在工程师占总人口比重方面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

像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岛屿国家本身

就很脆弱，面对生态威胁这些国家可以做些什么？

毛里求斯已经被列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了。虽然解决海平面上升问题的方案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必须加固并治理我们的土地，比如可以通过种植红树林来减缓海水对海滩的侵蚀，红树林可以为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提供非常优秀的生态系统。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继续植树，因为这是减少空气中碳排放的最可靠办法。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及水资源管理战略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加倍努力，因为水资源短缺将是未来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毛里求斯已经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请您具体谈谈毛里求斯采取了哪些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首先要说明的是，跟整个非洲大陆一样，毛里求斯其实并没有排放多少温室气体（GHG），但却是最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

我们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可再生能源、改善水资源管理以及国土治理的战略。但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确保所有基础设施符合绿色标准，或者其他一切可持续发展所列出的标准，例如使用更多的太阳能等。

我们必须鼓励所有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循环再利用和低耗能工业发展的技术。这些理念正在逐渐被接纳，比如有些纺织公司就已经在使用太阳能作为能源进行生产了。

教育和意识提升也是两个核心环节，因为政府在推进所有计划时都必须得到所有经济领域参与者的支持。



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统阿米娜·古里布-法基姆在柚子植物园。

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马斯克林群岛在可再生能源生产方面的情况怎样？跟留尼汪岛等其他邻居相比，毛里求斯的情况如何？

在马斯克林群岛中，留尼汪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估计他们可以生产高达 35% 的绿色能源。罗德里格斯岛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完全依赖可再生能源。毛里求斯也已经设立了好几座风力及太阳能发电站。我认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形势喜人，因为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您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100 名女性之一，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首先要感谢这本杂志对我的认可，我觉得这种认可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可以让全世界注意到我们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也有远大的志向，我觉得非常荣幸。

您在推特上写道，“非洲妇女是这片大陆发展议程的核心，但她们的贡献却很少得到评估和承认……”

是的，在非洲大陆，女性所作的贡献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就拿农业部门来说吧，是女性在供养着非洲这片大陆，但是在获得资助、产权或培训等方面，让女性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却还远不够完善。如果可以为女性消除这些障碍，我们肯定能在食物生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

在小学或高等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女童的就学机会仍然经常遭到剥夺。如果采取合适的措施充分调动她们的潜力，女性就可以真正为帮助非洲大陆走出困境做出贡献。

几年前您就想要开发治疗疾病的低价草本药物，能谈谈这一计划的进展情况吗？

90年代我在大学时曾经负责过一个传统药方认证的项目。2009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草本治疗研究中心 (CEPHYR)，这让当初那项工作的成果发挥了更多的效用。后来在2015年，公司发展成为国际药物开发中心 (CIDP R&I)。开发系列草本药物始终是国际药物开发中心的雄心所在，但是把研究成果商业化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

即使我不在公司任职了，这项工作仍会继续。你看，在国际药物开

发中心的努力下，罗德里格斯柠檬精油已经打入了香水制造业。毛里求斯很多药用植物是化妆品行业及制药业需要的植物成分的原料。

您认为权力就是能留下一一种产长期影响力的遗产的能力。作为共和国总统和知名科学家，您想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首先，我对科学和创新的热衷不会改变，只是我与决策者和其他机构打交道时的方式不同了。我支持应该投资各类研究机构的观点，因为这样可以年轻人获得足够的资金致力于解决非洲的一些优先事项，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熟练地掌握科学手段。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才组建了前面说到的非洲研究创新和创业联盟。

我希望能够留下这样的遗产，那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设立强大的研究

机构和给年轻人创造条件的必要性，要防止人才外流，就要发展他们的潜力并改善他们工作地的生态环境，这些都需要资金。不过我相信资金会越来越多，而所有这些都推动本地区国家的兴起。历史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投资越多的国家取得的成功也就越大。□

阿米娜·古里布-法基姆 Ameenah Gurib-Fakim 2015年6月当选毛里求斯总统。她是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莱雅杰出女科学家奖得主，也是马加斯林群岛药用植物研究领域著名的优秀科学家，目前是伦敦林奈学会会员、非洲科学院院士、约旦伊斯兰世界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非洲科学研究院成员。

小岛屿国家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 Daeung Lee

爱沙尼亚政府对技术的支持 值得各国借鉴

爱沙尼亚是一个仅有 130 万人口的小国，却是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自由之家¹评估，这个地处欧洲东北角的小国也是世界上经济、媒体和网络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样一个小国之所以能崛起成为一个数字化强国，秘密就在于政府采纳创新的“E-爱沙尼亚倡议”计划，培育创新教育、虚拟商业和数字化公民意识，取得了开拓性进展。

玛丽·若娜玛
Mari Roonemaa

将爱沙尼亚打造成“E-爱沙尼亚”
(这是前总统伊尔韦斯发明的昵称)

的励志故事始于1996年，政府支持的技术投资机构“虎跃基金会”功不可没。爱沙尼亚1991年从前苏联独立出来不久，就意识到对于一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国来说，在线经济和大规模技术创新才是发展的方向。在“虎跃”的帮助下，到90年代后期，爱沙尼亚所有的学校都已经上线，计算机网络和基础设施也获得了大量投资。

五年后，十家公私企业结成牢固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创立了“Look @ World Foundation (面向世界基金会)”。基金会获得了电信和银行利率方面的支持，在国内提升数字化意识，并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普及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 (ICT)。计划的第一个项目向102,697人 (这一数字大约是爱沙尼亚成年人口总数的 10%) 提供免费电脑培训，以弥合国内的数字化鸿沟。此外，爱沙尼亚的孩子们七岁就开始学习电脑编程。就这样，到2016年7月，在爱沙尼亚已有 91.4% 的人使用互联网，在 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 28.6%，涨幅惊人。

合作是关键

爱沙尼亚E-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合作与互惠。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起E-爱沙尼亚计划以来，历届政府都大力支持这一计划，私营行业、学术机构和民众也都合作支持计划的成功实施。说它互惠，是因为政府已经赢得了民众的信任，而民众也向政府完全公开了个人信息。爱沙尼亚的数字识别计划足以令比它大得多的国家羡慕不已——几乎每一个城市或州政府的服务都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在线上完成。

为保证透明度和问责制，爱沙尼亚公民可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 eesti.ee 监控个人隐私信息，任何试图获取自己信息的人都会被发现。也有过几个因不道德获取个人信息而获刑的例子，比如在医界或警界。爱沙尼亚数字化革命的先驱，2006—2016年间担任爱沙尼亚总统的伊尔韦斯曾经说过“你不可能贿赂电脑”。 ▶



¹ Freedom House,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其对各国民主自由程度的年度评估报告非常著名，常被用于政治科学的研究。

Skype的诞生地

爱沙尼亚已经敞开国门吸引人才，以刺激国内创业公司的发展。首都塔林目前有超过 400 家创业公司，被《纽约时报》誉为“波罗的海的硅谷”。给世界通讯业带来革命的免费视频通讯软件 Skype 就是在塔林问世的。

一张通话卡让爱沙尼亚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Skype”一词已经被录入了《牛津英语辞典》！其他还有一些创业公司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如提供货币兑换服务的 TransferWise，提供在旅途中从事符合专长的工作机会的网站 Jobbatical。

爱沙尼亚的第三产业部门，也叫“自由行业”积极推进开放治理和

“E-民主”建设。为了协调政策辩论的公共参与度，政府投资建立了三个不同的门户网站。国务卿路特认为“爱沙尼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法律起草和部委之间协调程序如此透明的国家”。

2016 年，爱沙尼亚被评为在将非政府组织 (NGO) 纳入开放治理行动计划咨询程序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去年开始运作的公民倡议门户网站Rahvaalgatus.ee 使公众发起倡议并将倡议送达国会成为可能。

在试验应用现代化决策程序方面，爱沙尼亚也进行了大胆尝试。Rahvakogu，即人民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这只是一个就修正选举法征询公众意见的平

台，但是在通过这个在线平台提交给议会的建议中，每 15 项中有 3 项都最终成为了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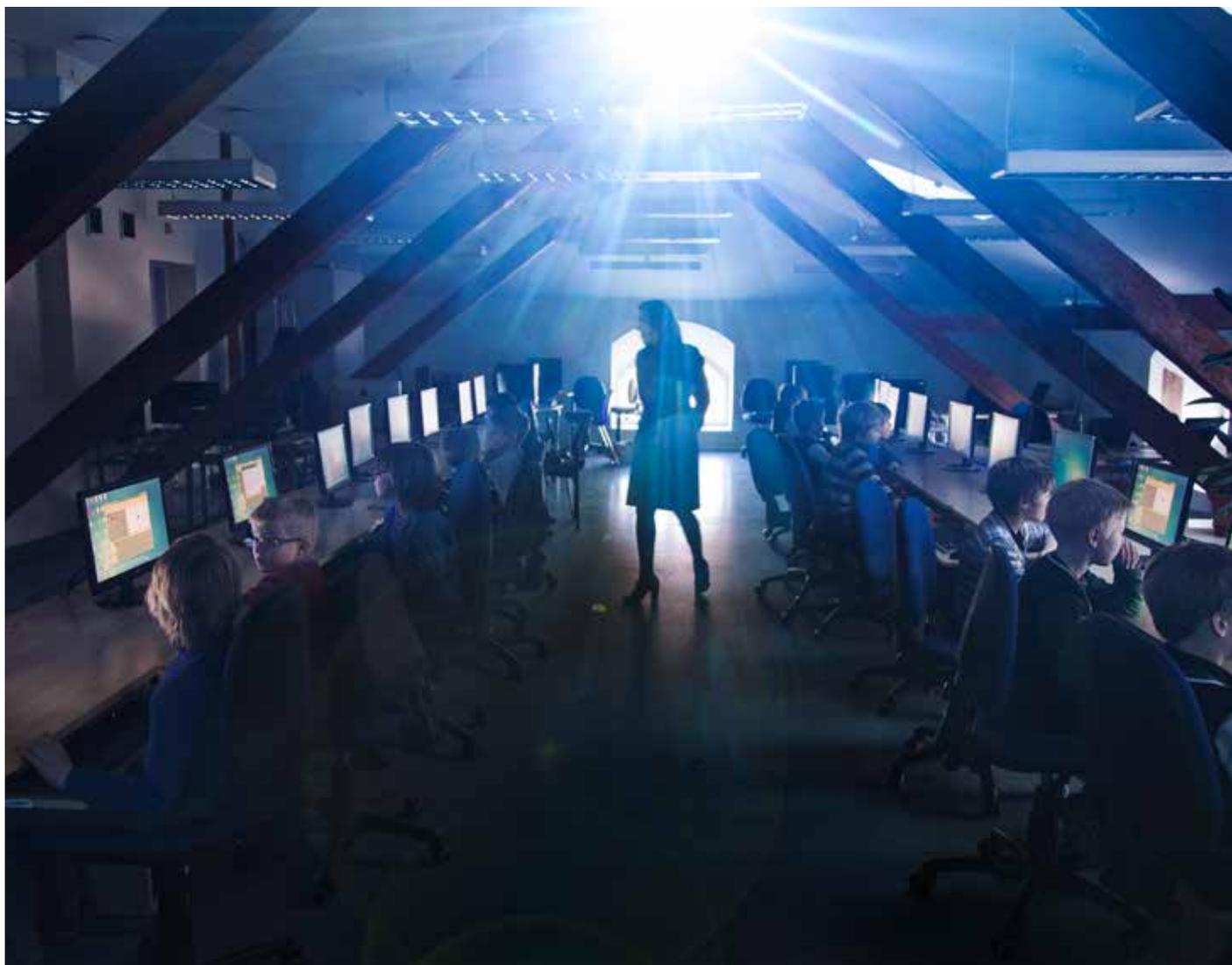
信息产业热潮

怎样让爱沙尼亚这只波罗的海猛虎继续飞跃？爱沙尼亚经济事务与通讯部信息社会局专家洛英松表示除政府之外，公众自身也都“渴求信息技术”。几年来，信息技术教育已经从学校进入社区和业余教育中。最近有超过200人（大部分是学生家长）在学习如何教会孩子们将机器人技术作为课余活动。洛英松说：“三分之一接触过IT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承认这对他们后来的职业选择有影响。”



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古母那西亚穆学校里的一堂编程课，这所学校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建于 1631 年。

© Stefano De Luigi/VII



位于塔林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古母那西亚穆学校。在爱沙尼亚的所有学校里，学生从七岁开始就利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学习计算机课程。

Eesti 2.0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由前总统伊尔韦斯提供资金支持），鼓励爱沙尼亚青年拥抱技术与未来，向学生提供多种技术工具和应用这些技术的主意。这个组织的网站 eesti2.ee 表示，他们要“培养跨领域批判性思维，将基于科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尽管机器人技术、编码俱乐部和编程都很吸引人，但是年轻人和E-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却并不缓和。洛英松说：“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掌握不同数字化技能的年轻人在需要做诸如数字签名之类的事情时却缺乏常识，他

们目前还不需要使用不同的E-服务，但一旦成年，他们就需要了。只要这还是个问题，他们就不能与 E-政府对话。”

另一个大的挑战是在老一代人中开展计算机扫盲，很多 60 岁以上的人都还在努力掌握初级技能。在“虎跃”的支持下，爱沙尼亚的许多公立图书馆都变成了网络中心，而老年人仍在用图书馆连接 E-国家，这样一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成了接受培训指导他人的“IT专家”了。

致敬2020

安全意识和数据保护依然是数字化时代的重要目标。公共权威一直在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和行动呼吁提升意识，在网上做明智的举动。例如，爱沙尼亚儿童福利联盟呼吁阻止性虐待儿童的内容在线上传播。教育信息技术基金（HITSA）开展了大量教育计划推进和加强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教育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合作。 ▶

其中最受欢迎的项目是洛英松发起的“虎跃”计划，这项公私合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利用结合了工程科学、设计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课程，教 7—19 岁的学生编程。

缺少优质教师依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塔尔图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维罗最近直言，再有十年也无法培训出足够的编程师资。他提议为高中毕业生开设在线课程。他说已经有针对成年人的开放在线课程（慕课/MOOCs），但更重要的是给青年一代开设类似的课程。

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了解数字化技术普及的情况。2018 年，我们将第一次了解真相，届时九年级的学生将参加首次数字化技术全国统考。我们知道大家能用计算机，但这个技能还不足以带来创新——我们必须能创造出数字化和技术性的内容。尽管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考试的结果看，我们有幸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沾沾自喜。要从事数字创新还须具备更高的能力，即创造数字和

科技的内容。2020 年，最值得掌握的技能是解决复杂问题、批判性思维、创意和人员管理能力，以及情商。我们还要找出让学生快乐的方法，这样他们才能持续从学习中获得乐趣。□

玛丽·若娜玛 Mari Roonemaa
“开放爱沙尼亚 (Open Estonia) 基金”媒体协调员，这个基金会在过去的 27 年里一直致力于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国家发展民主和开放社会。若娜玛曾任期刊编辑，目前是自由职业记者。

E-世界的另一面

新闻网站上发表自由匿名言论的空间曾被看作是一个展现“集体智慧”的绝佳机会，但现在已经堕落成“厕墙”。大型新闻门户网站上的在线评论已经成了新闻机构的一大难题，他们不得不面对那些成年累月向这些公共空间倾倒低俗、污辱性言论的读者。去年，爱沙尼亚第二大新闻门户网站 Postimees 决定关闭匿名评论区。

不过，媒体的自我约束问题也一直悬而未决。尽管在欧洲仇恨言论已经违法，但是爱沙尼亚并没有给它定罪。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提出了一条刑法修正案，但是没有获得多少公众支持。就此展开的公众辩论中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将危害言论自由。

玛丽·若娜玛

带来变革的创新伙伴关系

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是国际社会实现战略目标的最佳途径。通过对话和新思维，这个包容性的伙伴平台不仅有助于达成现有目标，也能有效地面对未来挑战。

习拉兹·西德瓦
Shiraz Sidhva

在 2017 年 1 月全球商业领袖云集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最时尚的配饰莫过于几乎随处可见的佩戴在西装翻领上的环形胸针——代表着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颜色。这些企业领袖将增加收益和销售量这类的短期目标抛诸脑后，共同谋求如何运用他们的优势地位和企业力量去应对气候变化、根除贫穷、推广全民教育、赋权于女性和阻止疾病扩散。

几十年来，私营部门一直与发展机构保持距离，直到 2015 年受联合国之邀与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科学界和公民社会携手，共同推动宏大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计划。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有包容性的群体合作契约。若非通过每个部门各司其职，便难以达成可持续、和平、繁荣的终极目标。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所说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福祉的大幅改善

在达沃斯以“为和平而合作：从根源解决全球危机”为题的特别会议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为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我们不仅需要鼓励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和学术界，更要鼓励商业企

业去践行这些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及 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并通过缔造新型伙伴关系将这些协议付诸实施，以应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与事件”。

古特雷斯秘书长继续谈到，根据近期统计，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能创造每年高达 300 亿美元的投资回报，他补充说，这些新型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大幅提升全民福祉”。

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宣誓就职联合国副秘书长几个小时后，在发表的演说中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在资金投入和伙伴关系上采取更为大胆的方法”，若不能保证各方都参与其中，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她敦促各国重新考虑在这些问题上的组织体系和方法。

她说，要想帮助其成员国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计划议程，联合国需要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她表示，“我们必须在建立伙伴关系和资金投入的方法上设法去创新甚至变革，并从长计议。” ▶



纳入企业界

保罗·波尔曼自 2009 年开始担任英国和荷兰跨国企业联合利华 (Unilever) 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企业领导团队的最佳典范。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倡导私营企业积极参与到解决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问题的行动中，找到重大挑战的解决方案。

当波尔曼面对股东时，他有关气候变迁的发言充满了说服力，他说：“我们已经超了一度，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大自然妈妈正在不断地给我们送来账单。”

而面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时，他的语调又显得积极乐观。他说：“我们有可能成为在 15 年内解决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第一代。”当他接来说“我总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的代表”时，全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样的发言显得不同寻常，但波尔曼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去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将他纳入由卓越名人组成的团体，“运用他们的身份和领导力”去推动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2014 年代表联合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基金，旨在促进公共和私人机构为了发展而协力合作。与私营企业相关的战略包含两个目标：在一开始就整合本领域各项计划的相关业务，并创建一个全球企业顾问委员会。

迈向结盟的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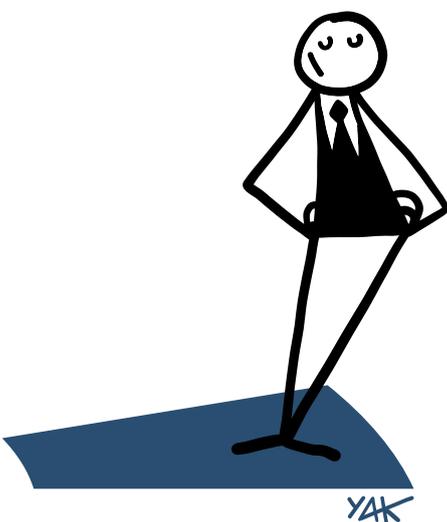
可持续发展计划 (SDG) 基金的

私营企业顾问团队由来自世界各地各行业知名企业的领导组成。该团队帮助这项基金“制定促进公私部门结盟的路线图，通过大规模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除了在开发商业模式方面提供帮助，顾问团队也亲自与公共和私人企业的股东们对话、倡导理念、提升意识、提供专家顾问服务，并与学术界合作提出新的联合解决方案。

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PPPs)，相关企业亦开始赢得在谈判桌上的发言权。例如，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 是一个全球性的由企业领袖组成的机构，有超过 200 家会员企业 (总营业额达 8.5 万亿美元，员工总数达 1,900 万) 和 70 个商业委员会。他们致力于开发高效的商业解决方案，以应对最棘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除了波尔曼，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执行主席安娜·博丁女士作为唯一的女性也位列该理事会由 15 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彼得·巴克表示：“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所需动用的资金达五万亿到七万亿美元……企业在投资和科技发展与创新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当然，更不用说，它们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引擎。”按照巴克的说法，可持续发展计划 (SDGs) “对任何一位致力于实现 17 项大目标及 169 项小目标的企业领袖来说，都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为了帮助企业找到正确的方向，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已经开始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的合作，并形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行动





交织的手影 —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省阿维莱斯市尼迈尔中心

指南”。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帮助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评估并宣传他们对气候变化、人权、贪污腐败等方面的影响。上述“指南”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提供指导并能评估所产生的影响。作为“指南”的补充，还开发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中枢”，巴克解释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平台，用以展现真知灼见、新兴工具和资源。”

不可能的盟友

从联合利华的案例我们可以看

出，企业集团参与可持续发展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已经见到了成效。斯图尔特投资公司 (Stewart Investors) 的投资分析师杰克·尼尔森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与小型农户建立的积极伙伴关系已能有效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适应力。”

2017年3月在德国波恩举办了第一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创意节，与会者加拿大籍医师阿拉·穆拉比特强调应在“不可能的盟友”间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计划，携手推动对全人类有益的全球发展目标。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

是“利比亚女性之声”的创始人。

2030计划呼吁建立革新且创新的全球伙伴关系，而世界银行早在30年前就致力推动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也就是公共和私人主体间的契约式合作。这通常被用于填补公共基础建设项目的财务缺口。▶

“可持续发展公共策略 (PS4SD)”组织创始人和研究员路易斯·梅乐曼和夫人英格博格·尼斯特里表示：“有必要从公私伙伴关系 (PPP) 转型为 ABC，即政府部门 (administration)、企业 (business) 和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享有平等的伙伴关系。”

路易斯·梅乐曼强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需要公民社会积极且有效的参与”。他又说，“在 ABC 伙伴关系中，三方都需重新调整各自的目标方向。就政府伙伴而言，他们应设法与社会伙伴合作实现具体目标，并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要达到降低成本和减少政府工作人员的目的。就商业伙伴而言，企业社会责任 (RSE) 除了创造附加值外，更应成为其综合的发展目标。”梅乐曼总结道，“只是简单地将公民社会纳入公私伙伴关

系是不够的，就像你可以给汽车装上翅膀但不能保证它就能飞——它还是辆汽车。”

方法转变势在必行

公私伙伴关系 (PPPs) 的批评者警告说，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在 2030 计划的框架下并不可行，必须加入第 4 个 P 代表民众优先 (People-first)。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下面的国际 PPP 英才中心大力倡导民众优先的公私伙伴关系，开启与股东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同时增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实力，以顺利实现各项计划。这些计划除了在经济方面具可行性，也可对经济转型发挥影响力。

孟加拉裔澳大利亚籍学者乔杜利 Anis Chowdhury 坚称：“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修补基础建设项目巨

额投资缺口的仙丹妙药。”他曾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担任多方利益相关者事务负责人，同时也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门研究论文《公私伙伴关系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法与目标是否相符？》的共同作者。

乔杜利说，“要确保公私伙伴关系可以有效提供各种重要服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各国具有开发、管理和评价公私伙伴关系的制度保障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资金来源而言。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需要国际社会在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给与支持”。▣



© Nilu Izadi/Millennium Images, UK

反映同一个现实的三个玻璃球。





许竟夕,
Hamo Jeju, 2014



© Hyung S. Kim



© Hyung S. Kim

金住利儿, Dodu Jeju, 2013



© Hyung S. Kim

姜善玉, Hamo Jeju 2014

海女：济州岛上活着的传奇

卡特琳娜·马尔克洛娃
Katerina Markelova

这些照片令人惊叹。几位年过 60、身着老款潜水衣的女人望着镜头。这些珍贵的图片总会让人心里充满疑问。“她的脸看上去让人觉得好像随时都要深吸一口气似的……这个人是一位海女。”摄影师金炯璇激动地说，他曾经长时间地观察“水滴从她的潜水衣上滴落，那潜水衣滑腻如海生动物的皮肤一般”。

2012 到 2014 年间，这位韩国摄影师多次来到紧邻韩国南部海岸线的济州岛拍摄“海女”。这些女人可以不戴氧气罩地在大海中深潜十米寻获海产品，而这种特殊的潜水形式被称为“水活”。对于海女来说，“水活”就是每天潜水7小时，每年潜水90天，不分春夏秋冬。

摄影师将这些女性从她们的日常工作中提取出来，以白色帆布为背景拍摄。照片是在她们刚刚结束“水活”上岸时拍的。“没有她们的工作地大海，也没有散落着她们从网中倒出的海产品的海岸，只有海女。”金炯璇这样解释说。没有了所有的视觉干扰后，观众就能将注

意力集中在照片中这些妇女的脸和身体上。摄影师认为这样才能“真实地展现海女”。这些图片展现了这些女性艰难的生活条件，而她们一直被看作是济州岛的象征。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儒家社会，海女是相当奇特的现象，2016 年济州岛海女文化被列入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提升了这些女性在当地社区中的地位，也肯定了她们环保的捕捞海产方式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这里的社区是以渔业合作的形式组建的，禁止使用任何现代化科技，以避免过度捕捞。

传统上这里的女性潜海作业是因为济州岛上贫瘠的火山土不适合大规模农业发展，但现在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转行进入其他领域，例如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据《纽约客》报道，济州岛60万岛民中，现在仅有4500名女性还在潜海捕捞，其中真正经常潜海的只有2500名，大部分是一些年过60的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女”已经不再是一个

别无选择的职业，而成了一种刻意的选择。

当地政府为保护这项悠久的遗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受好评的做法是自 2002 年开始实施免费医疗保险和免费发放潜水衣。

“海平面就是生死之间的分界线，而海女们频繁穿梭于这条分界线的两边。”艺术评论家朴龙泽这样感叹。济州岛特别自治道委员会成员李嵩华在接受《韩国时报》采访时表示，这些谦恭而勇敢的海女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她们对家庭生计和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有多么重要”。海女文化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国际社会的认可无疑会让她们找回自尊和自信。□



济州岛海女在户外烤火取暖，她们在这里换好衣服去做“水活”，干完后再回来这里休息。



济州岛海女收获的海产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两位济州岛海女下水前清洗护目镜。



济州岛海女举行萨满祭祀仪式，祈求海神保佑她们平安。



济州岛海女走向大海开始一天的“水活”——一种不带氧气面罩的深潜捕捞。



© Hyung S. Kim

玄倾泉, Onpyeong Jeju, 2014



© Maimouna Guerresi

“尖塔式帽子”系列中的一幅照片，意大利-塞内加尔多媒体艺术家麦目那-盖尔斯摄于2011年。

《古兰经》——文本与语境

当穆斯林看到恐怖组织以自己并不认同的伊斯兰的名义行动时，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更有力的回应？马哈茂德·侯赛因通过分析《古兰经》永恒不可违背这一前提条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马哈茂德·侯赛因
Mahmoud Hussein

“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IS) 倒行逆施的野蛮暴行和它以伊斯兰的名义发表的言论让大部分穆斯林感到惊骇，绝大多数穆斯林无法认同他们所说的这种伊斯兰教。然而，尽管他们在道德和人文层面谴责“伊斯兰国”，但在神学层面却难以正面反击。他们对这个组织怀有拒绝倾向，视其存在于伊斯兰教之外，声明“伊斯兰国”的言语不代表穆斯林，以此划清和它们之间的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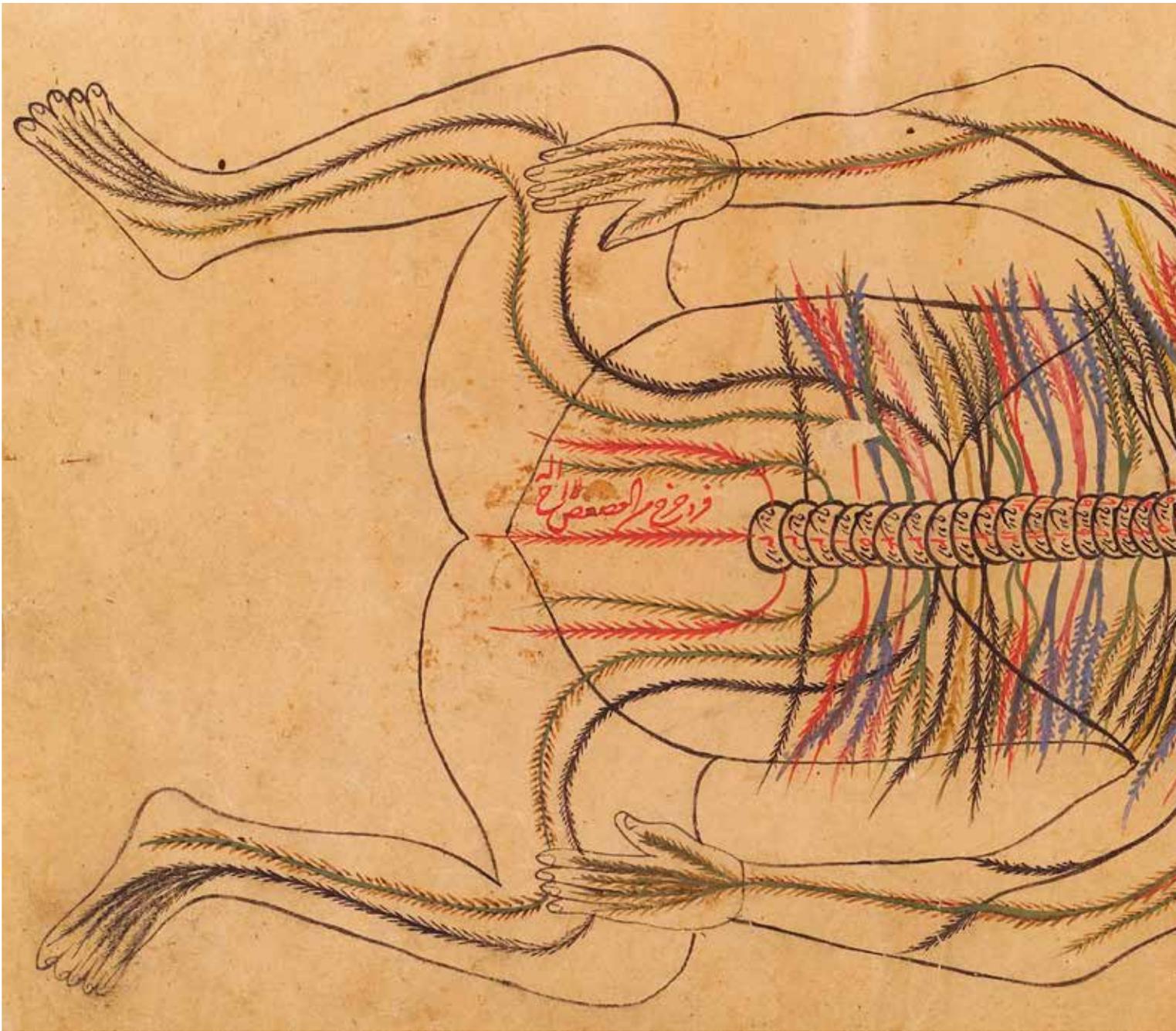
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伊斯兰国”确实声称自己起源于伊斯兰教，而且明确地引证了《古兰经》和圣训¹。要驳斥他们的言论，首先必须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伊斯兰教并不只有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伊斯兰教一直有着不同的、相互背离的表现形式，有些甚至截然相反、相互敌对。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出“伊斯兰国”是如何推广一种特殊的愿景，它不是试图赢得别人的支持，而是制造恐怖；它不是试图使人皈依，而是去唤醒人类最原始、最血腥的本能。“伊斯兰国”曲意解读《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

“伊斯兰国”应当在两个层面受到谴责，一方面，它从原始经文中断章取义，根据自己反人道主义的需要重新编排这些只言片语；另一方面，它把经文中那些适用于7世纪阿拉伯世界的部分诠释为绝对、永恒的训诫。“伊斯兰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神化女人对男人的臣服，并为奴隶制辩护。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永远污名化所有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而那些污名其实只是在冲突的背景下、在一个与我们的时代已毫无关系的年代里针对某些特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做出的评判。

恢复自由意志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世俗化的穆斯林虽然对“伊斯兰国”持有同样反感的态度，却又不大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呢？因为要这样做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激进的观点。他们需要明确地接受一个事实：神启既是永恒的教诲，又是受环境制约的法规。换句话说，他们将不得不质疑《古兰经》的永恒不可违背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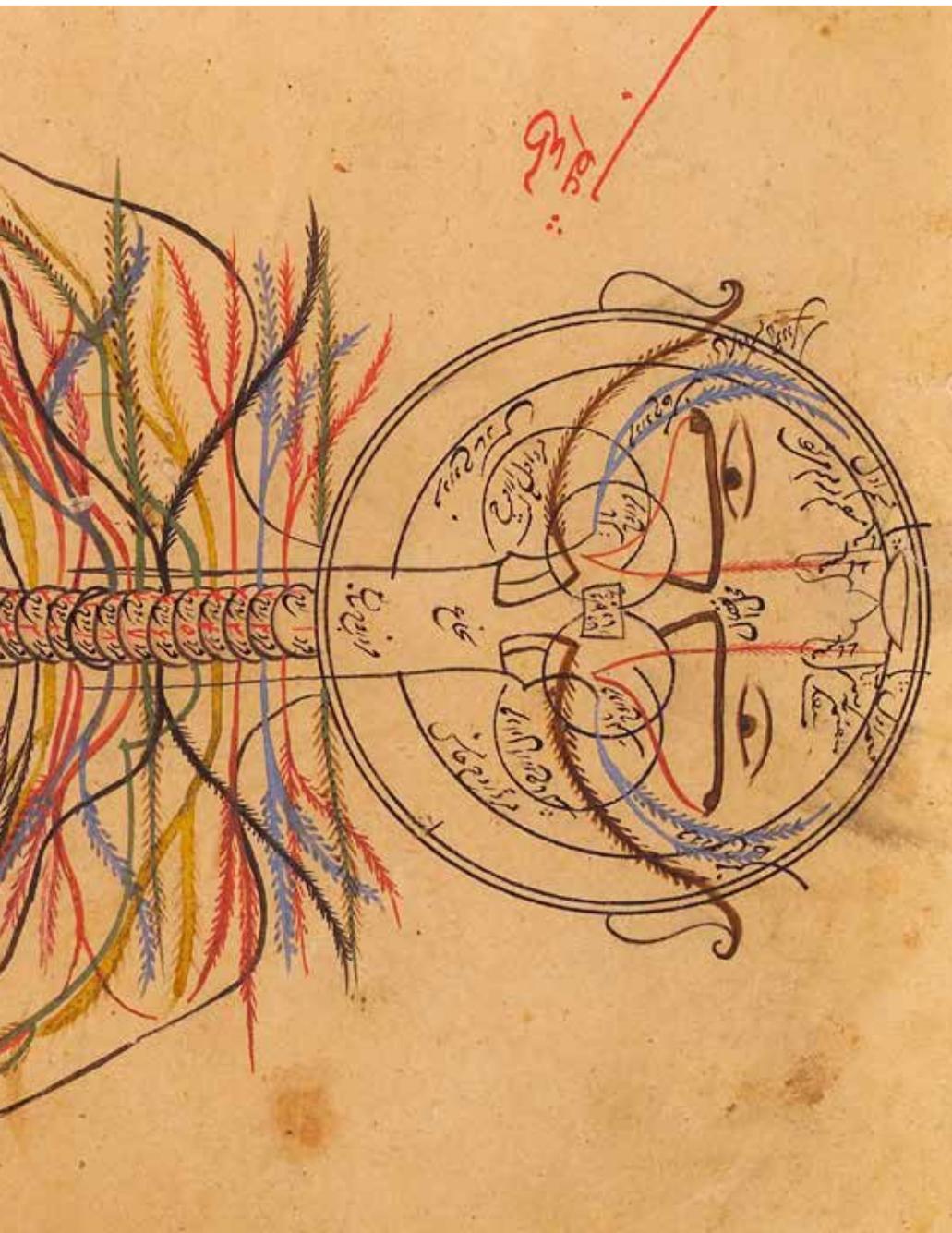
¹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由后人所编。



《伊本·西那医典》(1025年) 中的神经系统插图。

这种永恒性建立在乍看上去无可辩驳的逻辑之上：《古兰经》记录的是真主的话语，而真主是绝对不会犯错的，所以《古兰经》中的所有经文肯定理所当然是永恒的、普遍的。于是当很多穆斯林看到那些只适用于7世纪阿拉伯世界、已明显与我们今天的道德要求不相符的经文时，就会产生一种良知上的危机。

然而这种危机其实只是杞人忧天，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背叛《古兰经》核心真理的前提下驳斥这种永恒不可违背性的教条。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只有背弃了这种盲目的教



条主义才能找到《古兰经》最根本的真理。因为这个教条并不是出自《古兰经》本身，而是 9 世纪时才附加给《古兰经》的一个思想前提——就是认为真主的话语等同于真主，具有和真主一样的神性，并且也和真主一样是永恒的。

而事实上，这个前提完全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在《古兰经》里，真主和真主的话语并不具备同样的地位。真主是超越时间的，但是真主的话语却是受时间限制的。真主的话语体现了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精神与世俗的相互作用。这

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古兰经》作为一个时时处处都要一字不差地永远遵守的清规戒律。

但是如果这一教条与《古兰经》的本意相违背，那它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被穆斯林世界所接受呢？这其实是 9 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发生的一个长期斗争的结果。

那个时代，各类大胆的思想流派并存，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与绝对的神权并不矛盾，真主赋予人类理性判断的能力

和创造力，也叫“qudra”（全能），借此人类可以自由行动。法拉斯法（哲学家）派则形成了另一个理性学派，他们置身于神学领域之外，遵循希腊的哲学传统，希望包容一切领域的知识。

但后来，无论穆尔太齐赖派还是法拉斯法派都遭遇了一股日益强大的保守思潮的挑战：传统的守护者、法学家和神学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下定决心要消灭自由意志，坚称它挑战了真主的全知全能。两股思潮的决战体现在如何看待《古兰经》经文的性质上。 ▶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古兰经》是真主“创造”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真主,而是真主在创世时的某一刻形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它有时间维度,给人留下了一定的解读余地。而反对派则认为,《古兰经》是“非创造”的。换句话说,它与真主是同质的,和真主一样是永恒的。因此,沉浸在《古兰经》中、通过不断反复吟诵经文吸纳《古兰经》的神性远比理解《古兰经》更重要。这样一来,经文就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可捉摸的真理,于是也就有了《古兰经》永恒不可违背的理念。

永恒不可违背的论点最终在这场思想冲突中胜出,于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自由意志的思想从伊斯兰的土地上败退下来,直到19世纪晚期才再次出现。

在杰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改革派的思潮在启蒙运动精神的启发下,利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开始质疑神圣不可违背性这一教条。这一运动并没有质疑神启的神圣起源,而是开始审视早期神启出现的历史真实性。

这样一来,改革派与教条捍卫者之间就有了矛盾,后者指责前者所使用的方法论工具,即人文及社会科学中普遍应用的批判性推理,不具备合法性。教条捍卫者们断言,任何认为《古兰经》的神启与真主的永恒意愿不完全符合,设想神启可能与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的想法,都是非信徒的谬论。这种谬论是从外部看待神性的,证据就是这种观点的论据来自读神的、与伊斯兰教无关的学科。

探寻 9 世纪的记录

现在我们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能不能摆脱这一指责呢?我们能不能不借助世俗科学而完全依赖那些就连最死板的教条捍卫者也无可辩驳的宗教文本来证明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必要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能够用于这种诠释的宗教文本确实存在,而且一直就有。这些宗教文本是应伊斯兰教创立后第一个世纪里古兰经学校的急切需求而出现的。当时的学者们需要审视神启出现的背景才能解读许多晦涩难懂的经文。

他们着手应对这一挑战,回到所有与神启时期相关的可用信息之源——先知的同伴留下的证词。大部分的追随者当时对先知向他们口述的经文并不完全理解,于是他们就会独自或结伴去向先知请教,而先知也会向他们解释、评论或举例讲解不同的经文。先知离世后,向不断壮大的信众传播先知所言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同伴身上,而这些同伴所说的话中已经加进了他们自己关于得知经文的时间和地点的记忆。

当最后一批先知的同伴离世后,人们开始搜集他们的这些证言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到八九世纪之交,出现了署名穆罕默德·伊本·易斯哈格(Muhammad Ibn Is'haq)的一部最早的汇编,题为《穆罕默德先知生平》(*Al-Sîra al-nabawîyya*)。此后陆续还出现了一些汇编,最著名的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四位记录者的著作:瓦基里(al-Wâqidî)的《征战史》(*Kitâb al-Maghâzî*)、伊本·赛阿德(Muhammad Ibn Sa'd)的《先知同伴大事记》(*Kitâb al-Tabaqât al-Kabîr*)、泰伯里

(al-Tabarî, 839-923)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Kitâb al-Rusul wal-Mulûk*)、和拜拉祖里(al-Balâdhurî)的《贵族谱系》(*Kitâb Ansâb al-Ashrâ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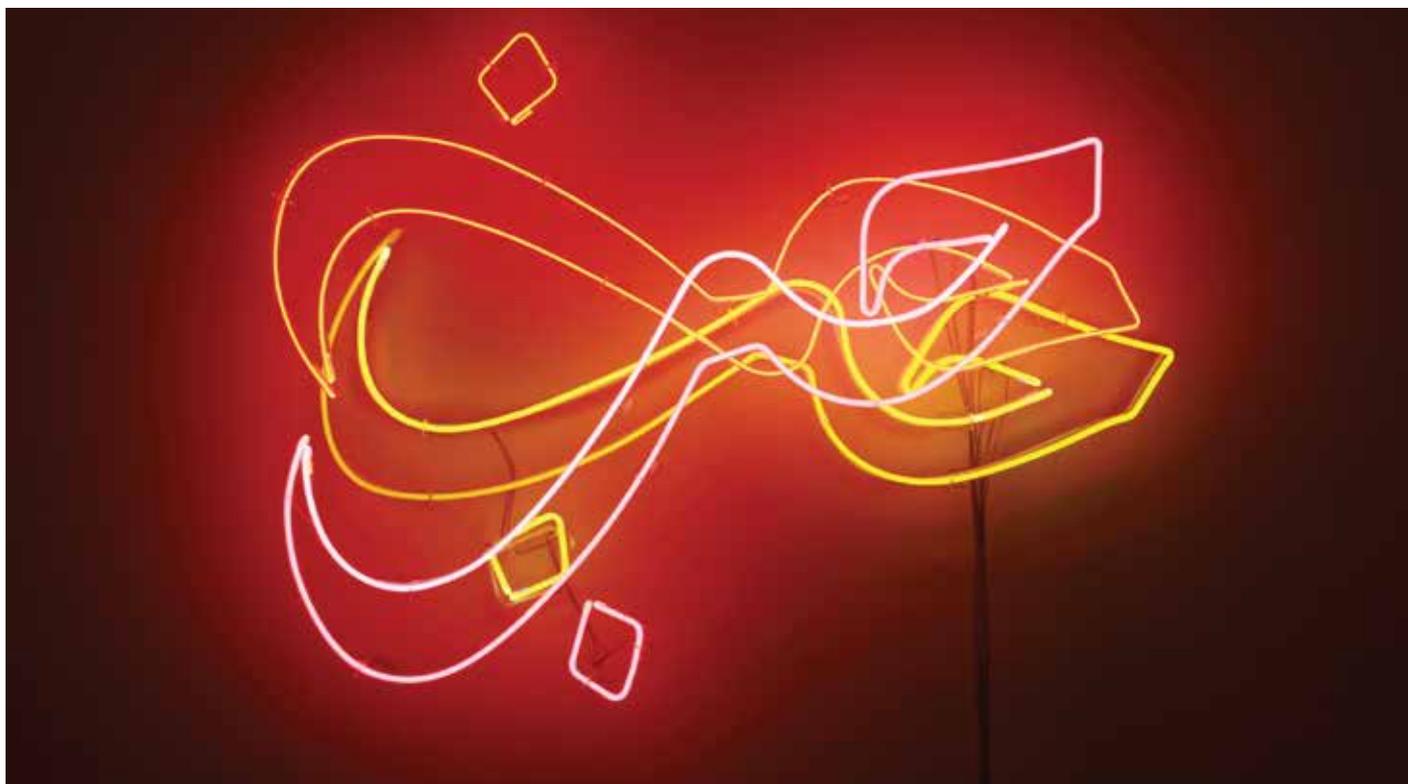
这些记录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们向我们讲述了先知的生平,主要事件基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述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记录,我们才大致掌握了神启降临的时间顺序,可以把数百篇彼此相关的经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把每篇经文置于适当的语境中。

结合这些记录来读《古兰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允许将真主和真主的话语混为一谈,也从来没有允许由真主的永恒推演出真主话语的永恒。把《古兰经》文本置于其历史语境中阅读,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在《古兰经》里,真主的话语是通过反映7世纪阿拉伯世界所存在问题的语言、文化和思考方式呈现的;二,在《古兰经》中,真主的话语并不是独白,而是以天地之间交流的形式呈现的,真主通过先知与第一批穆斯林信徒进行着实时对话;三,真主的所有话语分量并不完全相同,《古兰经》阐释了不同层次的真理,一些是绝对的,另一些是相对的;一些是永恒的,另一些是依情况而定的。

事实的确如此,有时真主甚至会用一些真理来取代其他真理,喻示用后来启示的经文废除此前的某些经文。

废除的原则在经文中是这样表达的:“除非有更好的或类似的经文可以替代,否则我们不会废除一篇



法国-阿尔及利亚艺术家朱利卡·布阿伯代拉创作的霓虹灯雕塑 (2010 年), 题为“两个情人, 三个字”。

经文, 或让它从记忆中消失。”(第二章, 106)

所以, 由此看来, 时间的概念在《古兰经》中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 只有时间才能恢复真主的全部力量。正是因为真主会随时介入, 所以他才会给出与不同情况相关的相对真理。随着情况的变化, 相对真理也会发生变化。所以, 如果真主说了两件互相矛盾的事, 那是因为真理在此期间发生了变化。真主在他说话的那一刻总是正确的, 要理解真主的相对真理, 我们就需要把每一条真理与它出现时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绝对的维度, 就不可能有一篇经文比另一篇“更好”。在绝对维度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同等的, 没有比较的可能性。如果一篇经文比另一篇“更好”, 那么这两篇经文就肯定都存在于相对的维度中, 而它们也只有与不同情况相关时, 或者说在时间变化时, 才有两篇经文都正确的可能性。

因此, 《古兰经》中有时间的先后顺序, 有“以前”也有“以后”, 甚至有一个时间取代另一个时间的时候——于是就有了真实的时间维度。所以结论非常明显: 真主的话语不能等同于真主本人, 话语不能被看作是真主的神性本质。我们不能, 千万不能, 在读《古兰经》时把它的每篇经文都当作真主神性的化身, 甚至连最细微的差异都是对真主的背叛。

一旦将真主的话语与真主区分开来, 一旦看到真主的话语具有人类固有的时效性, 《古兰经》永恒不可违背性的假定也就不再成立。这个假定不仅不能反映《古兰经》的真谛, 甚至还与之背道而驰。因此, 《古兰经》本身就要求信徒理性思考, 运用自由意志, 自己分辨决断哪些经文应当遵守, 哪些已经与他们不再相关。

这样一来, 《古兰经》对信徒而言也就不再是一整套随时随地必须遵循的训诫和禁令。它再次成为被先知和他的同伴们 22 年中所奉的

《古兰经》: 一个重塑世界的开放话语; 一个要求人们负责任地思考和行动的呼吁; 一个赐予每一个人的在日常生活找到真主之路的机会。□

马哈茂德·侯赛因 Mahmoud Hussein 是两位法国-埃及作家**巴赫贾特·埃尔纳迪 Bahgat Elnadi** 与**阿德尔·里法 Adel Rifaat** 的共用笔名, 他们出版过一系列标准教科书: 《生平》(*Al-Sîra*, 2005)、《思考古兰经》(*Understanding the Qur'an Today*, 2009), 以及最新发表的《面对“伊斯兰国”挑战的穆斯林》(*Les musulmans au défi de Daech*, 2016)。

“沙里亚¹”不是什​​么？



© Maimouna Guerresi

摩洛哥哲学家阿里·本马克洛夫认为，沙里亚最初并不是一套固定的准则，而是一个道德规范导向的精神源泉，用于遏制滥用政治权力。在这篇文章里，他回顾了“沙里亚”转变成法律的过程。

阿里·本马克洛夫
Ali Benmakhlouf

在时下的讨论中，伊斯兰教法“沙里亚”（sharia）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并会引发各种虚幻的联想：恐怖统治、体罚、休妻、恐怖组织的极端要求、伊斯兰教早期的陈旧法律、与人权不相容的惩罚体制，等等。

然而必须要知道的是，把沙里亚法假定为固定权威或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专制政权的利益，这些政权在这种恒久不变的法律体系上建立起了自己政治权利的永久性。

从词源上看，“沙里亚”在阿拉伯语中是“大道”“开放”或者“道路”的意思。哥伦比亚大学瓦埃纳·哈拉格（Wael Hallaq）教授解释说：“沙里亚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一整套信仰体系。”

沙里亚转变为神圣法律的过程其实源自一个力图对沙里亚进行诠释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被称为“ijtihād”，是一批高素养的伊斯兰法学家力图把《古兰经》内容“翻译”成法律条文的结果。

《古兰经》出现一个世纪后，各伊斯兰教国家先后建立了很多法律学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神圣法律。无论他们如何诠释，也无论不同的法学家和哲学家之间有怎样的分歧，所有的学校都一致认为，伊斯兰的神圣经文只是一个源泉，而不是法律的实际内容。他们都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可以看到的经文中是不可能呈现出完整的神圣法律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所谓的沙里亚法规。在先知预言和《古兰经》中都找不到这样的法规。

到了近代，埃及神学家阿里·阿卜杜勒拉兹克（Ali Abderrazik，1888-1966）也提醒人们注意沙里亚是一个精神指导，不含任何法律指令。所以，要由人在其他东西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组织社区的体系。

沙里亚与政治

一场伟大的辩论从中世纪就已经开始，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辩论的双方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思潮：一方认为，沙里亚应该是富有政治含义的，等同于法律，因而法官，就

“尖塔式帽子”系列中的一幅照片，意大利-塞内加尔多媒体艺术家麦目那·盖尔斯摄于2011年。

¹ 伊斯兰教教法。

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所说,是“一个宣读法律条文的喉舌,一种完全被动的存在,不能调节法律的强制力和严苛程度”;而另一方则相反,他们认为法院的审判规程应该有自主权,应当允许法官从沙里亚中汲取宗教灵感,在法庭裁决中形成对政权的制衡。

第二种思潮认为,统治者有一定的酌情权,可以引用在某些领域的具体案例中适用的行政条令来替代宗教律法。这就叫“siyasa”(“政策与神启法兼容”),瓦埃纳·哈拉格在《伊斯兰法导论》(2009)一书中分析说,这是一种遏制政权滥用的工具。

前现代国家倾向于将沙里亚与政治权力分开,尽管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非常清晰,而且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相反,在现代后殖民主义社会,沙里亚却被看作是成文法的一部分,尽管在一些国家里它的应用范围仅限于与个人身份相关的事务(如婚姻、继承权等)。现代对法律的理解是以法典编纂和控制为基础的,这就使法律成为了纯粹的国家工具,沙里亚的政治化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法特瓦因时而异

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沙里亚是一个灵活、可调节的认识论概念。俗话说,“法特瓦(Fatwa,伊斯兰教的宗教裁决)因时而异”,这清楚地说明,司法意见并不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事实上,法特瓦的原意是指不具备约束力的司法意见。正如瓦埃纳·哈拉格在《伊斯兰教法中的权威、连贯性及变化》(2001)一书中所强调的,法律要随着“时间或者社会条件的变化”

而修订。

此外,变化的必要性被明确认为是神圣法律的主要特征,中世纪的哲学家法拉比(Al-Farabi, 870—950)等人曾描述了历届立法者修改法律的方式。在他的《宗教之书》中,他解释说这些调整有助于:1)弥补前任立法者留下的空白,因为前任只就“对于凝聚社区来讲最重要的、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和最有效的事情”颁布了法令,其他的就留给了别人;2)“改变前任的一些管理方法,并采用一些更适应时代变化的规章制度”。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神启的律法与人对律法的诠释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诠释应该由称职的专家来完成,而不是那些没有学问的人。

瓦埃纳·哈拉格在《伊斯兰法导论》一书中指出,“因而伊斯兰法还具有法律多元的特征”,他解释说“这不仅是因为它承认地方习俗并认真对待这些习俗,也是因为它对同一类事实提供了一批不同的观点”。所以在瓦埃纳·哈拉格看来,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欧洲殖民者指责伊斯兰律法僵化,应该被新的拿破仑法典取代,并由此开始试图废除沙里亚,才催生并助长了那种认为沙里亚超越历史、超越时间的观点。

当精神指导变成绝对命令

这种试图废除沙里亚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其间“沙里亚”一词通过“法特瓦”变成了一种绝对命令的形式,并被赋予裁决权,尽管法特瓦其实仅代表一种咨询意见。

在曾被所谓西方列强(主要是法国和英国)殖民统治过的国家里,随着现代法律和从国家权力中衍生出的法律的发展,以及议会制的推广,沙里亚被与大多参照拿破仑法典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并列起来。鲍德温·杜普雷和利昂·布斯肯斯在他们为2012年出版的《今日沙里亚》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指出,“赋予伊斯兰教规权威的正是议会程序的制约”。

今天,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宪法中对沙里亚的引用各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它需要被顺从,另一些则认为它仅是个参考,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它衍生于任何成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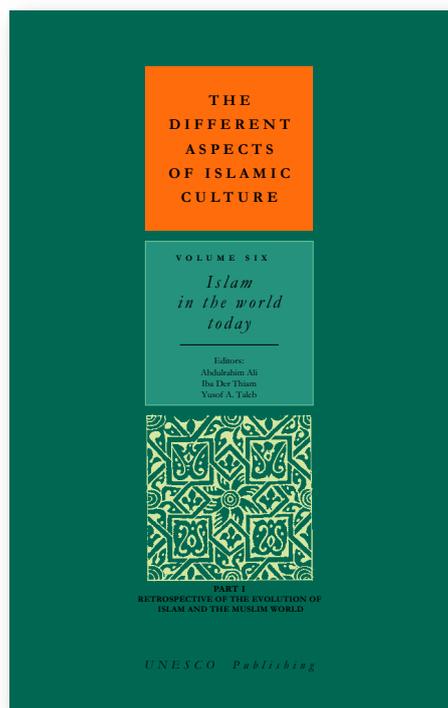
应当看到,“沙里亚”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确,它并不是指一套众人熟知、可以被确定地应用于这里或那里的规则。用鲍德温·杜普雷的话说,我们越想明确定义沙里亚,我们就越难捕捉它的轮廓和功能。除了用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语汇之外,我们究竟还能怎么定义沙里亚呢? □

阿里·本马克洛夫 Ali Benmakhlouf, 摩洛哥, 巴黎东郊雷泰伊大学哲学教授, 法国大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著述颇丰, 主要作品包括《阿威罗伊》(Averroès, 2000)、《对话, 一种生活方式》(La conversation comme manière de vivre, 2016); 主编过《十世纪巴格达的哲学》(Philosopher à Bagdad au Xe Siècle, 2007), 还出版过几部关于东西方伟大思想家的作品。

我们时代的参考书

《伊斯兰文化面面观》(1—6卷, 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 1977—2016)。

娜依德·阿弗罗斯·卡比尔
Nahid Afrose Kabir



今天,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对穆斯林和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都存有很多误解。在西方国家很多人的眼里, 穆斯林是由一群没有个性、压迫妇女的暴徒组成的铁板一块的群体。在有些亚洲国家,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但现在穆斯林似乎也突然变得“不同”了。

自从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 “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叙述划分一直被用来将穆斯林族群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 有些政治人物甚至提议禁止或终止所有穆斯林移民。

必须承认, 确实有极少一部分穆斯林误入了恐怖主义的歧途,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 穆斯林就像其他人一样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可谓深受其害。

为了消除当今社会对穆斯林的一些误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适时出版了六卷版教育性丛书《伊斯兰文化面面观》(*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Islamic Culture*, 1977—2016), 这部教育性丛书的集体创作始于1977年, 于2016年11月全部完成, 丛书共计六卷。

这套书向读者介绍了伊斯兰教

教义的起源和教规习俗, 通过对教内不同信仰派别的描述展示了伊斯兰教的多样性, 可以说是既适应时代要求又有助于增长知识, 将为目前广泛展开的关于伊斯兰教的辩论做出重要贡献。

在阅读这套书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明白“清真”的概念是如何从伊斯兰教的教派中发展起来的, 也会看到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穆斯林思想家是如何一直反对对《古兰经》做狭隘、专断的诠释, 而是鼓励信徒善用理智。

关于女性, 这本书也提出了非常有趣的深刻见解, 尤其介绍了8—13世纪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期间女性占据的优势地位, 书中还探讨了20世纪初出现的穆斯林女性主义者, 她们让阿拉伯世界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这套以伊斯兰文化为主题的丛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伊斯兰文明的突出贡献, 特别是在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例如, 代数就是穆斯林发明的! 丛书向读者再现了穆斯林苏丹王国辉煌的历史, 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迄今存留在艺术作品和建筑中, 如印度的泰姬陵。丛书告诉我们, 由于丝绸和



© Enciklat/Shutterstock

沙特阿拉伯，
麦地那，先知寺
内景 (al-Masjid
al-Nabawi)

香料贸易的成功，东方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在历史上有一些时期比西方基督教国家发达很多。然而正当亚洲和非洲的穆斯林国家因商业贸易而繁荣时，西方国家开始了领土扩张，建立起殖民体系。

这套丛书不仅给出了大量古代的史实，也介绍了近代穆斯林世界的情况：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紧张局势，如伊朗革命、两伊战争、塔利班势力的崛起、克什米尔冲突，以及世俗法制国家与伊斯兰法制国家之间的势力消长等，贪腐、公共卫生资源缺乏、经济不平等和文化程度低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

书中涉及的另一主题也非常重要——当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强调

的，面对边缘化、反伊斯兰主义和歧视困扰的，正是这些穆斯林少数民族和他们所在的社区以及穆斯林移民。

除了上述内容外，这套丛书还分析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关系的积极面，并提供建议帮助双方更好地达成互谅。这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丛书适合不同的读者群，无论是好奇者、学术界人士、公民社会，还是决策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娜依德·阿弗罗斯·卡比尔 Nahid Afrose Kabir, 孟加拉裔澳大利亚穆斯林，目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Alwaleed Bin Talal 王子穆斯林——基督教徒理解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她是《伊斯兰文化面

面观》(*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Islamic Culture*) 丛书中“当今世界穆斯林少数民族”一章的作者，此前还发表过许多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包括《穆斯林美国人：有关美国人和非美国人概念的辩论》(*Debating the Notions of American and Un-American*, 2017)、《青年美国穆斯林：身份的变化》(*Young American Muslims: Dynamics of Identity*, 2013)、《青年英国穆斯林：身份、文化、政策与媒体》(*Young British Muslims: Identity,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2010)、《澳大利亚的穆斯林：移民、种族关系与文化史》(*Muslims in Australia: Immigration, Race Relations and Cultural History*, 2005) 等。



© UNESCO/P. Chiang-Jo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任命阿法迪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巴黎，2016。

阿法迪：让非洲创意获得世界认可

阿法迪坚信“文化是发展的基本起点”，他致力于支持非洲纺织工业，并在整个非洲大陆推广传统技艺。这位国际知名的时装设计师，非洲国际时装节的发起人，现在已经成为争取经济发展的象征，他的最新梦想——在尼亚美创办一所时装与艺术学校——也即将成真。我们采访到了这位“沙漠魔术师”。

采访者
雅斯米娜 Jasmina Šopova

您说自己是“泛非主义者中的最泛非主义者”，请问这是为什么？

泛非主义既存在于我的血缘中，也是我的信念。我出生在廷巴克图，母亲是摩洛哥人，父亲是阿拉伯裔尼日尔人，我在尼日尔长大，在多哥上过学，还在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科特迪瓦都有亲戚。所有这些国家都混合在我的家族传承中，这是非洲团结与尊严的标志，我觉得非常自豪。

您是怎么进入时装界的？

我从小就一直有创作的冲动，但是直到父母去世后我才终于有机会把这种冲动表达出来。对我的父母来说，让我进入时装界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觉得那是“女人的工作”，而且与伊斯兰教不相容。

为了尊重他们的意愿，我去巴黎学了旅游专业。当时我白天上课，晚上就去看时装秀，终于接触到了很多当时最著名的设计师。1980年，我获得了旅游专业的学位后，就回到了尼日尔在尼亚美贸易部的旅游局工作。

而三年后，您却在尼日尔展示了您的首个时装系列……

一点不错，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已故的克里斯·赛义杜一起做一个非洲纺织品项目，他是个很优秀的马里设计师。但是后来只剩我一个人了，于是我倾尽全力自己创建了一个编织刺绣工作室。后来我才去巴黎夏尔东·萨瓦尔（Chardon-Savard）时装学校接受了培训。

您是如何为这个项目融资的？

最初我用自己挣的钱在尼日尔投资了一家纺织厂，由此诞生了阿法迪纺织品。后来我受益于公务员主动离职计划，获得了创业计划贷款，还有欧盟的补助，买了我的第一批机器，雇佣了第一批员工，于是就有了阿法迪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1985年在巴黎打出了名气。

那是在国际旅游业博览会上，帕高·拉巴纳、伊夫·圣洛朗以及其他一些我在巴黎上学期间认识的设计师和模特都来为我帮忙捧场。 ▶



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时刻是在 1987 年的第二届巴黎国际时装周上，所有时装界的重量级人物全都来了，出场的有几千名模特、几万名观众、还有十亿电视观众在世界各地观看！看着自己设计的系列在特洛卡代罗花园中露天走秀，还有西非吟游诗人和骆驼的陪伴，那感觉真是棒极了！

这次时装周是对您所有付出的认可，也是对手工艺人工作的认可。

当然。我和一些非常有才华的手工艺人一起工作。一开始我就雇佣了十几位织工、二十几位缝纫、刺绣和珠绣的技工。后来，我还在尼日尔组建了一个珠宝团队，在摩洛哥创建了一个皮革团队。

进入 21 世纪，我开发了一个使用非洲原料制作的化妆品和香水品牌。2005 年，我设计了一个运动系列，包括牛仔裤、T 恤衫等，价格都是年轻人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在努力为非洲人创造价值，为他们提供工作，并确保他们的创意得到认可。我在尼日尔、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马里、塞内加尔、摩洛哥等不同的国家生产纺织面料，同时我还在倡导重开非洲的纺织厂。

您是怎样宣传支持重开这些工厂的？

举个例子吧，2014 年我去多哥参加了支持重新恢复多哥纺织业的非洲腰布节（Le pagne en fête）。在多哥阿塔帕梅附近一个叫达茶的村子，过去曾经有一个 3000 人的工厂，大概 15 年前工厂倒闭了，工人全部失业，而他们生产的非洲印花棉布就被转到荷兰生产了。我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是我真的认为

非洲的纺织品更适合在非洲生产。

复兴非洲纺织工业、提升非洲传统工艺从一开始就是我设计生涯的核心所在，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您现在有多少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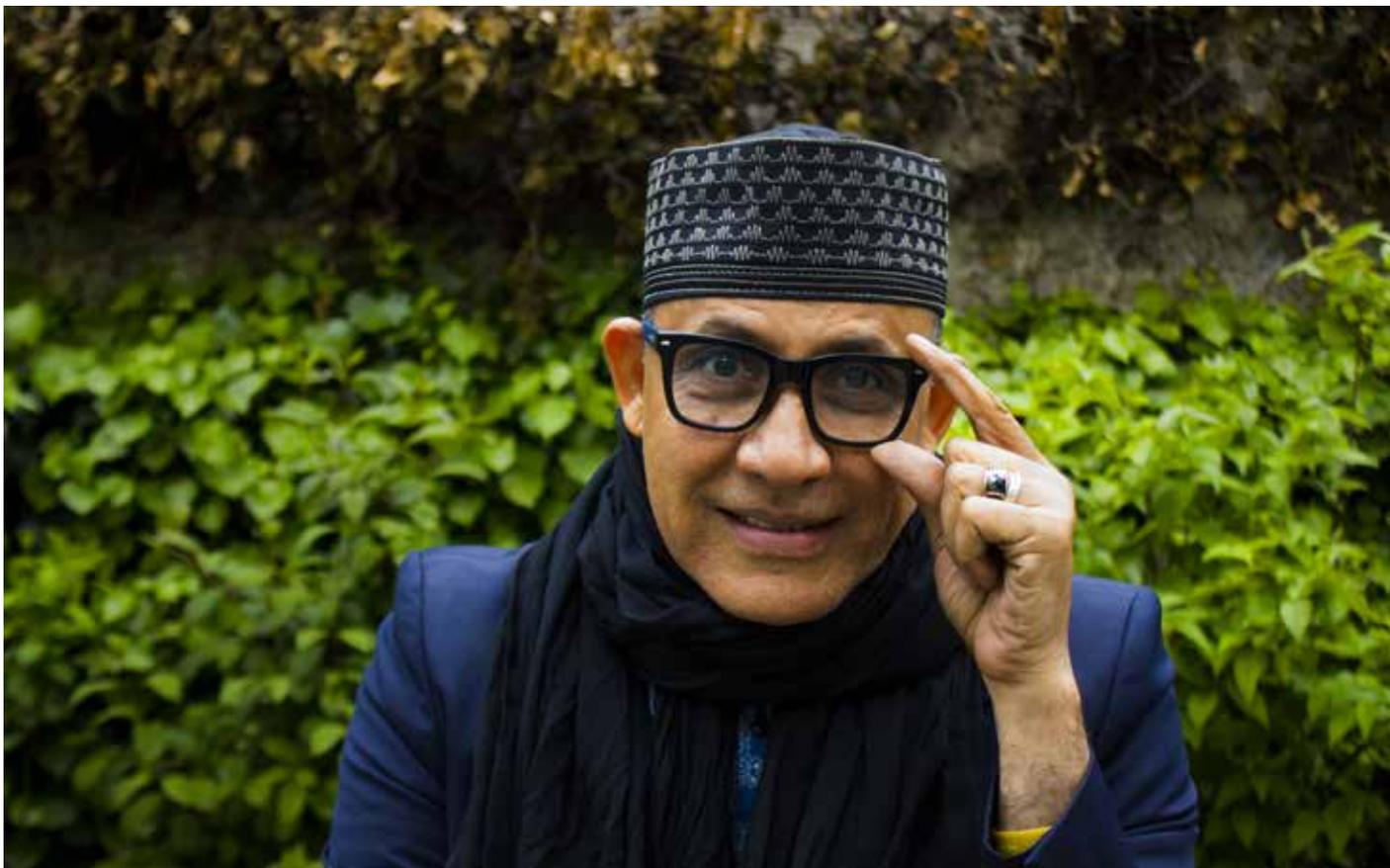
不算分包商的话，我现在大概有 150 到 200 名员工，我觉得一个时装制造者同时也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创造者。我一直坚信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起点。再举个例子吧，我刚进入时装领域的时候，尼日尔是世界第四大铀产国，而我一直强调，尼日尔的时装行业可以成为一个比铀更安全的财富来源，但是那个时候没人拿我的话当回事，现在铀的价格大幅下跌，而时装业的发展却是风生水起。

从 1994 年非洲设计师联合会成立以来，您就一直担任联合会的主席，能谈谈您在那儿的工作吗？

联合会是在加纳成立的，随着非洲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总部的的位置一直在搬迁。必须承认，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们的雄心，但是我在竭尽全力促进丰富多样的非洲时装与设计的发展。我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做好品牌的保护工作，特别是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鼓励非洲国家遵守国际商标体系。

您在沙漠中创办了一个时装周！谈谈您的这项冒险吧。

这是我最自豪的一件事！非洲国际时装周（FIMA）是 1998 年在尼日尔的提吉迪沙漠中诞生的。它实现了我的很多梦想：展示非洲创意、



阿法迪 (全名西达莫德·阿法迪·萨义德纳力)
2016年5月摄于巴黎。

推广年轻设计师、促进交流、文化交融、凝聚、多样性、和平……这些都是我最看重的价值！

要知道第一届时装周举办的时候，图阿雷格叛乱还在尼日尔肆虐。所以那届时装节的标志是一个艺术化的图阿雷格头巾。我就是想要再重现头巾昔日的荣耀，把它变成和平而不是战争的象征。

2016年的时装周也是以和平为特色的。

是的，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一个交融、和平的非洲”，我们还向纳尔逊·曼德拉这位象征着和平的人物致敬。我设计了一套白色高级订制系列，并在街道上组织了一次游行，所有人都身着白色的服装，那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和平、文化和发展是每一届非洲国际时装节的关键词。时装周每两年举办一次，吸引了来自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的设计师，也有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嘉宾参加。虽然时装周主要弘扬非洲时装文化，但最后一天的主题是将全世界聚到同一个秀场上。

2016年12月，我们与尼日尔手工业工商会在尼日尔北部的阿加德兹传统活动竞技场合作举办了第十届非洲国际时装周。那届时装周的主题是“以教育与产业建设和而不同的非洲”。那届时装周能够成功举办我觉得特别高兴，2015年，由于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世界的事件，尤其是发生在西非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取消了原本定在11月举办的时装周，因为做不到零风险，我们当时认为无法确保公众及参与

者的安全。

尼日尔文化复兴、艺术和社会现代化部部长阿苏马纳·马拉姆·伊萨 (Assoumana Mallam Issa) 主持了第十届时装周开幕式。他宣布支持非洲国际时装周把时装与高级服装业作为永久发展工具的使命。因为时装周现在已经成为尼日尔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我们以后将每年举办一届。

非洲青年设计师在时装周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

事实上他们在时装周上有特殊的地位！从2003年起，我们和法国艺术行动协会合作举办每两年一届的青年造型师竞赛，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和法国文化院合作举办这个竞赛。 ▶

每次我们都会收到 250 到 300 份竞赛报名材料。一个国际评审团会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开会，选出三位优胜者。在过去五年里，竞赛的奖金是由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赞助的。

我们还设立了一个非洲模特奖，支持他们获得更多机会成为顶级超模。

能给我们谈谈“阿法迪大篷车”吗？

这个想法源自我的游牧民族情怀。就是在每届时装周之后，一个由大约 40 名设计师、模特、时尚专家、赞助商和记者组成的团队会前往非洲各地组织阿法迪时装秀。这让我们有机会结识各个地区的青年才俊，我们的评审团会在其中挑选可以在下一届时装周期间展示自己设计作品的设计师。

您有没有其他帮助推广非洲青年设计师的计划？

目前我的一个大项目是在尼亚美

创办一所国际时装和艺术学校。十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梦想，两年前我得到了一块用于建学校的地，尼日尔政府给了我们3000平米的地。我现在正在从其他渠道筹措资金，好让我的这个梦想尽快实现。

施工规划已经就绪。我们预备建设一个工厂式工作坊，接待来自尼日尔及国外的大约 30 位设计师。他们将可以在这里设计自己的作品，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这里制作、出售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还计划为海外设计师和教师提供食宿，开时装店、开办有纺织材料馆的时装博物馆、以及搭建时装秀场。

这个想法部分是受到了法国电信业公司 Free 的创始人克萨维埃·尼埃勒的启发，他创办了一所私立非营利性的免费计算机编程学校——42 学校，这所学校的侧重点是才华和团队精神。巴黎的夏尔东·萨瓦尔工作室也在帮助我们实施这个项目。

我们将在捐助者的帮助下建设



© Dou Matar Gueye

2013年的巴黎非洲时装周上的阿法迪秀。



尼日尔沙漠中举办的首届非洲国际时装周，1998年。

学校，但是学校的运作将是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适当收取培训费。阿法迪基金会将会设立奖学金，学生也可以通过在学校的时装店出售自己设计的作品来支付一部分学费。学校还会设立一个“文化托儿所”，给9—10岁的少年学生提供6—8个月的艺术创意和时装设计课程。

阿法迪基金会的作用是什么？

我最初在2000年创办了阿法迪协会，这个协会和非洲国际时装周联系紧密，主要活跃在教育领域，但也不完全局限于此。比如我组织了好几次“telethon”电视募捐，其中2012年为马里难民开办的那次节目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一共募集了约52,000欧元善款和近80吨粮食。

目前，我正在创办一个阿法迪遗产基金会（基金会章程已经完成）。这个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女童与妇女的培训，也会关注健康及营养不良等问题。

我经常开玩笑说，比起男人来我更信任女人，因为一个女人挣了钱会喂养照顾自己的孩子并送他们上学；而一个男人有了钱，他通常会用这笔钱给自己找……第二个妻子！■

阿法迪，全名西达莫德·阿法迪·萨义德纳力 Sidahmed Alphadi Seidnaly，绰号“沙漠魔术师”，1957年6月1日出生于马里廷巴克图的一个商人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一起在尼日尔长大。他自己现在有六个孩子，穿梭于美国、法国和非洲三地。2016年1月25日，阿法迪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同年4月23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非洲通史》艺术家国际联盟”。

教科文组织《信使》谨以本次采访献给5月25日世界非洲日。



© Steve Munding, 2016

2016年4月29日丘乔·巴尔德斯在白宫举办的国际爵士乐日音乐会上。

钢琴家丘乔·巴尔德斯：“我探索每一条可能的道路！”

继2016年的华盛顿和白宫盛会之后，国际爵士乐日（International Jazz Day，每年4月30日）将来到古巴，哈瓦那将在这一天成为这种无疆界音乐的世界之都。第六届国际爵士乐日的活动目前正在筹备之中，我们有幸采访到活动主角之一——古巴钢琴家丘乔·巴尔德斯（Chucho Valdés），请他向我们介绍了这场特殊活动的详情。

露西亚

Lucia Iglesias Kuntz

担任采访

您去年曾经参加了国际爵士乐日的庆祝活动，请问那次活动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活动非常精彩。那是我第一次去白宫，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这些爵士乐手组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曾经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同样的音乐节庆祝活动，但这一次感觉就像是家庭团聚，而且就音乐而言，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和我一起演奏的有：美国的贝司手、非洲的吉他手、澳大利亚的小号手和印度的鼓手，非常令人难忘，尤其是奇克·柯瑞亚、艾瑞莎·弗兰克林、贺比·汉考克、艾尔·贾诺和马克思·木勒和其他一些爵士乐巨星也都在现场，像这样众星云集的场所真是非常难得！我们证明了爵士乐是国际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可以聚在一起共同演奏爵士乐。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就像是爵士乐的父母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庆祝它辉煌的普遍性。

您今年将参加在哈瓦那举办的国际爵士乐日活动，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吗？

是的，我接到了哈瓦那的邀请，非常高兴能再次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聚在一起。我希望爵士乐能

一如既往地展现它的“即时”感：我们就凑在一起，决定一个主题，然后即兴演奏，每个人就这个主题呈现自己的手法和风格，每个人的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排练一千次，每一次听起来都会不同，这就是爵士乐的魅力所在：它总是千变万化，而听众也总能分享自己的观点。我们还不知道这次要演奏什么，这才叫棒呢。和以往一样，这次也将是自发表演，因为即兴演奏才是爵士乐的特色。

这次我们演出的场地是阿隆索大剧院，剧院的音响效果一流，钢琴也非常好，是2015年10月我和著名钢琴家郎朗与古巴交响乐团合奏时，由施坦威钢琴公司赠送给古巴文化部的。一想到不知这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都感到非常兴奋，观众更是如此！

您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亲善大使，是什么让您接受这一称号的呢？

粮农组织在世界各地帮助有需要的人，能为他们贡献一己之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给一部关于2010年海地地震的纪录片配过乐，这么做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所有票房收入都捐给了海地灾后重建基金。

请问您平时如何创作音乐？

我刚才说过，虽然有时会演奏现成的音乐，但爵士乐主要还是即兴演奏，在古巴语中我们把这叫作“pie forzado”，通常是别人给你一个主题，然后你就开始即兴创作。我们也会创作一些演奏必需的和声和和弦的谱子，但也会留下足够的空间给你发挥创意。

就我而言，我每天排练，以便在我自己的长期经验和非洲-古巴爵士乐根源之间建立起节奏基础；这种爵士乐混合了约鲁巴鼓、巴查鼓（尼日利亚、汤加和贝宁约鲁巴人的鼓）和古巴康佳鼓的节奏，这些多元节奏组合非常适合用作即兴演奏的节奏主线，或是用作即兴演奏所需的铜管乐器、甚至钢琴混音的旋律主线。有了这些，你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发掘了，因为这些音乐编排是你以后即兴演奏的创作基础。

请问您总是与同样的音乐家合作吗？

我和我的乐队“非洲—古巴信使”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现在也经常一起演出。不过有时候我也表演钢琴独奏或者与交响乐团合奏，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最近，我刚刚在纽约和Arturo O'Farrill的交响乐团录制了一张唱片…… ▶

也就是说一般我不会限制自己走





丘乔·巴尔德斯

单一的音乐路线——我会探索每一条可能的道路，我尽量不束缚自己，而是不断变化，找到新的路径。

您是如何开始学习钢琴的呢？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我自己其实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据说我就是这样开始学琴的。我的父亲曾经是古巴著名的“热带”夜总会驻场乐团的钢琴手和副指挥。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多著名的爵士音乐家都在那里演出过。

我三岁那年，有一天我父亲因为忘了带下半场演奏会的乐谱而回家了一趟，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在用双手演奏钢琴，接着发现那个人是我，他问我母亲和祖母是谁教会我弹琴的，她们都说没人教过，并说我只是想试着模仿他，他每次出门后，我就坐到他的琴椅上学他弹琴。据说我就是这样开始学琴的，后来他就开始教我弹琴，我五岁时他为我请了一位乐理老师，九岁时我进入了一所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之后您曾和您父亲合奏，请问和拜博·巴尔德斯合奏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与父亲兼老师同台演出会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感触。因为我一直都非常欣赏拜博的琴艺，

每次跟他合奏我总能学到新的东西。我15岁时开始和他一起现场演出，为给电视台录节目，我们也同时在两架钢琴上演奏。我想我得算是拜博·巴尔德斯的头号仰慕者。他是位很有才气的音乐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父亲，还是一位要求非常严格的老师。有时星期天我想去看电影，当我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时，就被父亲叫住，他会说：“你明天有钢琴课，坐下来把你练过的曲子弹给我听听。”如果弹得不好，他就会说：“听着，今天不能去看电影，去把衣服换了，坐下练琴。”现在回过头看，我对他非常感激，因为我当时学得非常认真，并且尽全力追随着他的音乐脚步。

请问您也教过您的孩子弹钢琴吗？

我有六个孩子，他们都演奏音乐，而且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倒不是因为教了他们音乐，而是因为他们都非常热爱音乐，这肯定与家里整体的音乐氛围有关。我跟丘吉托合奏过，也和我女儿蕾雅尼斯合奏过，她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在意大利和古巴上过学，现在无论演奏还是作曲都非常棒。艾米里奥演奏打击乐器，尤西学的是合唱团指挥，而且和杰西一样，也打爵士鼓。我最小的孩子朱利安今

年十岁，我刚让他上了音乐课。

现在这个时代电子音乐盛行，数字化高速发展，我们怎样鼓励年轻人继续演奏爵士乐呢？

自从60年代组建第一个乐团Irakere以来，我和各种乐坛新秀都合作过。对我来说，电子和电脑是21世纪的标志，所以很多人在用各种软件程序配器，比起50年代的时候，编曲现在已经容易多了，年轻一代熟练掌握了这些新技术。我相信这些新技术非常有用：那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获得过六项格莱美奖和两项拉丁格莱美奖的“丘乔”原名**迪奥尼索·杰苏·瓦勒迪思·罗德里格兹**，1941年出生于古巴的基威坎市，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和指挥家，著名非洲—古巴爵士乐钢琴家拜博·巴尔德斯（1918—2013）之子。丘乔录制过90多张专辑，并与人合作过50多张专辑，其中非常流行的专辑包括*Lucumi*（1986）、*Solo piano*（1991）、*Pianissimo*（1997）、*Babalú Ayé*（1999）、*Boleros inigualables*（2000）和*Border free*（2013）等。

看，我多美！

埃斯特与母性



这张照片被评为表现和平主题的世界最佳图片，是2015年阿尔弗莱德·弗里德摄影奖获得者、比利时摄影师帕特丽西亚·维罗克（Patricia Willocq）拍摄的15张系列照片“看，我多美！”中的一张。

这个系列展现了一个因母亲遭到强暴而生的小女孩人生中的几件大事：她的出生、她迈出的人生第一步、她上学的第一天、她的婚礼、和她自己初为人母的第一天等。

帕特丽西亚给女儿取名为埃斯特，并把她的出生地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见证过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和性暴力。在每张照片里，埃斯特都处在中心位置，在一群支

持和保护她的男人中长大，这些男人其实也是施害者，但是在照片中，他们保护她并给予她应得的尊严和疼爱。

照片中所有的孩子在真实的世界中都是因母亲遭到强暴而出生的，而所有的妇女也都曾遭到过性侵。帕特丽西亚的照片都是精心摆拍的，几乎会让人觉得造作和不悦。但这种貌似浮夸的做法却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乡村田园的背景、多彩的盛装和灿烂的笑容让这些女性重获尊严和骄傲。

评审团表示：“这个系列就像是一个非洲童话，在童话里施害者变成了保护者，善良战胜了邪恶。这是一个关于幸福生活的比喻：在这

里拥有童年、可以上学、有职业、有家庭、可以实现自我，所有这些权利都受到尊重。这些照片表现得并不是伤感而是传达出强烈的人道主义信息——和平的主要内容是宽容、尊重和欣赏。”

《信使》谨以此页献给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2017年6月19日）。

在线培训法官，保护新闻记者

专门为拉丁美洲法官设计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MOOCs）培训了他们宣传和保护言论自由的能力，有助于他们提升这一地区的记者安全状况。今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重要时代的批判性思维”，就培养批判性思维而言，还有什么比为法律体系的守护者提供培训更好的方法呢？

罗森塔尔·卡尔蒙·阿尔维斯
Rosental Calmon Alves

2013年5月，在哥斯达黎加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新闻自由日2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我向联合国促进与保护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弗兰克·拉鲁表达了对慕课的积极支持。这些旨在通过网络提供无限参与和开放资源的在线课程到2012年才开始流行，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美洲新闻骑士中心帮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慕课计划。几次慕课就让我们为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记者——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近十万人——提供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获取的顶尖技能的培训。

在跟拉鲁探讨了向世界各地传播免费新闻培训的“魔术”后，我们又讨论了当时我们正在参加的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主题：寻找终止针对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的途径。

在许多拉美国家，谋杀或袭击记者而不受制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根据教科文组织2016年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生的记者谋杀案中仅有11%被侦破。正如这一地区许多专家所注意到的，这些有罪不罚的现象会进一步引发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

近年来，保护记者委员会不仅将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列入了对从业记者最具致命威胁的国家，还将这些国家排在了全球有罪不罚索引的首位，这个索引是一份排名，索引中所有的国家里都有谋杀记者的凶手未受惩罚。

我们当时就在想能否以慕课为工具减少这一地区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能不能利用慕课为法官提供关于言论自由和记者保护方面的培训？

梦想成真

当时出席会议的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卡特琳娜·波特罗对这一想法也很热情。不久，教科文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及智利传播和信息顾问吉列尔梅·卡内拉·戈多伊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共同努力将为法官开设慕课这一梦想变为现实。

2014年至2016年期间，题为“关于言论自由、信息获取和保护记者的国际法律框架”的慕课让拉丁美洲3,000多名法官和司法人员从中受益。这项课程是教科文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和骑士中心共同合作的成果，已经惠及了除古巴以外所有拉美国家的法官。



拉鲁目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部助理总干事，波特罗现在是哥伦比亚波哥大安第斯大学法学院院长。他们与美洲人权委员会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爱迪生·兰扎一道正在修订和改进第五期言论自由慕课，这期课程将于 2017 年 5 月 8 日，也就是教科文组织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世界新闻自由日会议几天后推出。

这期慕课沿用骑士中心新闻培训的非同步授课模式，以便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开课期间（本期课程为期六周，从 2017 年 5 月 8 日到 6 月 10 日）按照自己的情况安排学习日期。课程内容以周为单位划分模块，每个模块包括视频授课、阅读材料和论坛，学生必须就相关主题

展开讨论并回答指导老师提出的问题，达到课程要求并完成学业的学员将获得证书。

试水

2014 年秋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发展计划（IPDC）的资助下，我们启动了专门针对墨西哥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的试点项目。我们当时仅是在试水，拿不准墨西哥法官们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结果他们的反应出乎意料得好——我们一共收到了 1,000 多份申请，最后被录取的有 932 名来自墨西哥各地的法官、检察官、法庭书记员和其他法庭工作人员，墨西哥最高法院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也是这个项目

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找对了方向：运用数字技术提供高质量培训，成本-收益率比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更合理。

鉴于课程主要是面向墨西哥司法机构的，我们邀请了墨西哥城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法学院教授米格尔·拉瓦戈博士讲授墨西哥的言论自由法律框架，还有来自同一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玛加丽塔·托雷斯博士负责主持慕课中的讨论，同时帮助学生与授课教师建立联系。

在墨西哥的两个试点项目取得成功——其中一个是国家级项目，另一个是在科阿维拉州的项目——我们于 2015 年秋季推出了第一个为拉丁美洲法官开设的慕课。 ▶

瑞典政府为这个项目提供了支持，随后，伊比利亚-美洲司法学校网络和伊比利亚-美洲司法峰会也提供了支持，最终这期慕课共吸引了1,200多名学员。

辅导员发挥高效

第二年推出了第二期的慕课，学员筛选更加严格，法官的申请被优先考虑。对于被录取的624位报名者来说，这一期的主要变化是安排了一组辅导员——他们都是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地区的律师，在接受了波特罗的培训后负责辅导课程。例如，辅导员负责引导论坛上的讨论活动——这是慕课的核心部分——并回答学生提出的法律问题。这期慕课的另一个创新是，讨论活动按地区或国家分组，为讨论、介绍案例及参考资料提供了方便。辅导员工作得十分出色，所以2017年的课程也设立了辅导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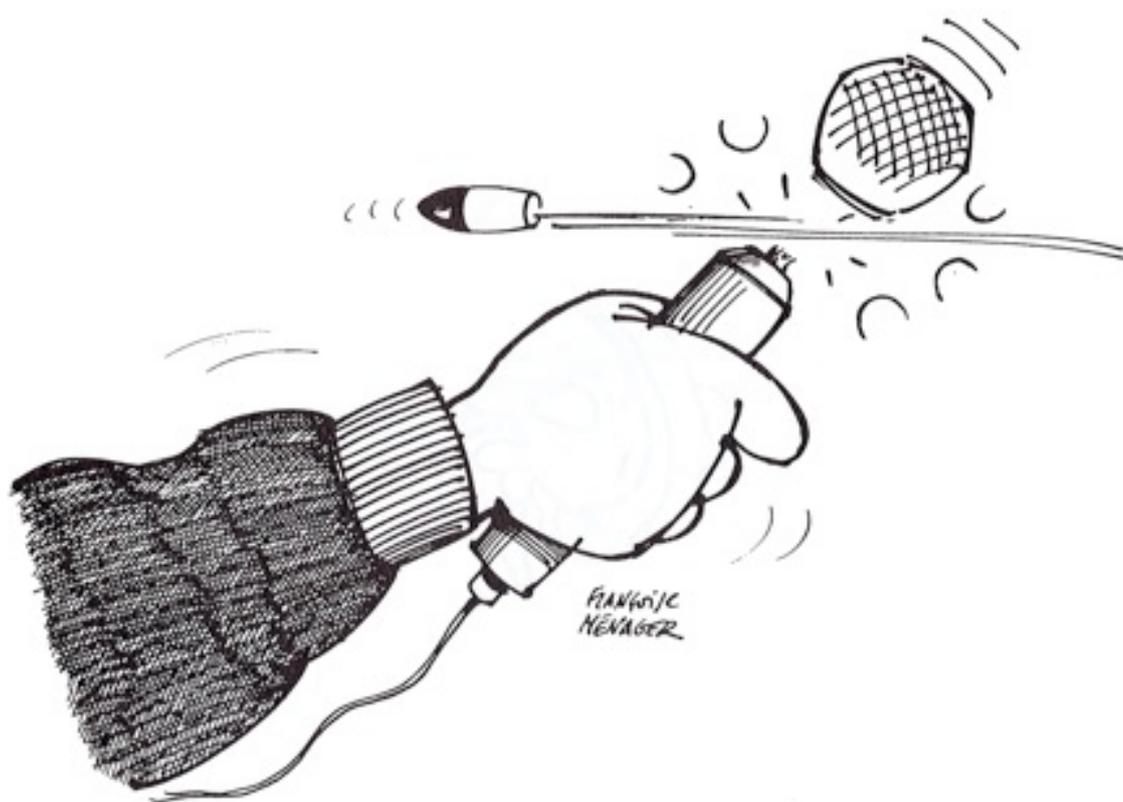
与骑士中心所有的远程学习项目一样，学生们都获邀对每一期慕课的课程及教师进行评估。到目前为止，结果非常令人鼓舞，无论是对课程、平台的使用，还是对指导老师和辅导员所作的评估，满意率都非常高。

一名学员在评价中这样写道：慕课“改变了我对维护和保护言论自由权的必要性的看法”。一名来自上诉法院的法官参加了2016年的慕课，她表示，课程让她“对言论自由这一主题有了更广泛的认识”，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更详细了解它在国际层面的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加强民主社会法治的重要支柱”。她表示“理解这一点让我很震撼，以后我在上诉法院做出裁决时会考虑到这一点。”

哥斯达黎加会议四年之后，拉丁美洲对记者来说依然是世界上最危

险的地区之一。但越来越多的法官正在学习了解有关言论自由、信息获取和保护记者的国际法律框架。而慕课正是一个推动进一步理解这一地区言论自由问题的具体行动实例。■

罗森塔尔·卡尔蒙·阿尔维斯 Rosental Calmon Alves 是他的祖国巴西线上新闻报道的先驱，也是美洲新闻业骑士中心的主席和创始人，这个中心为世界各地数千名记者提供在线培训。阿尔维斯现在主持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国际新闻学骑士教席，并于2004年至2016年期间主持教科文组织传播教席。他曾担任过教科文组织通讯领域全球教席网络（ORBICOM）的秘书长。



探索海底深处的奥秘

尽管海洋对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直接影响远远大于火星，但我们对海底地形的了解却远不如对火星表面地形的了解。不过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绘制详尽全球海底地图的能力，这对管理渔业资源、应对环境变化、了解海底沉积物的运送、海啸预警以及矿产开采等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谷伸
Shin Tani

我们对地球海底地形的了解还不如对火星表面地形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更倾向于投入对其他行星表面的探索，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水下地图测绘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在极深的水域。

水会吸收、反射、折射光线，所以即使通过视觉媒介，视线在水下也很难穿透超过几十米的距离。目前我们对大面积海洋的地图绘制还很粗糙，尤其是那些远离海岸线和国家的海洋区域。今天我们对极地冰架和冰层覆盖下海洋环境的了解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海洋地图测绘先驱对深水海洋的了解多多少。

但是随着卫星测绘和多波束声纳测绘的出现以及遥感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拥有了一整套越来越广泛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具备了详细测绘海底地形的能力。

多波束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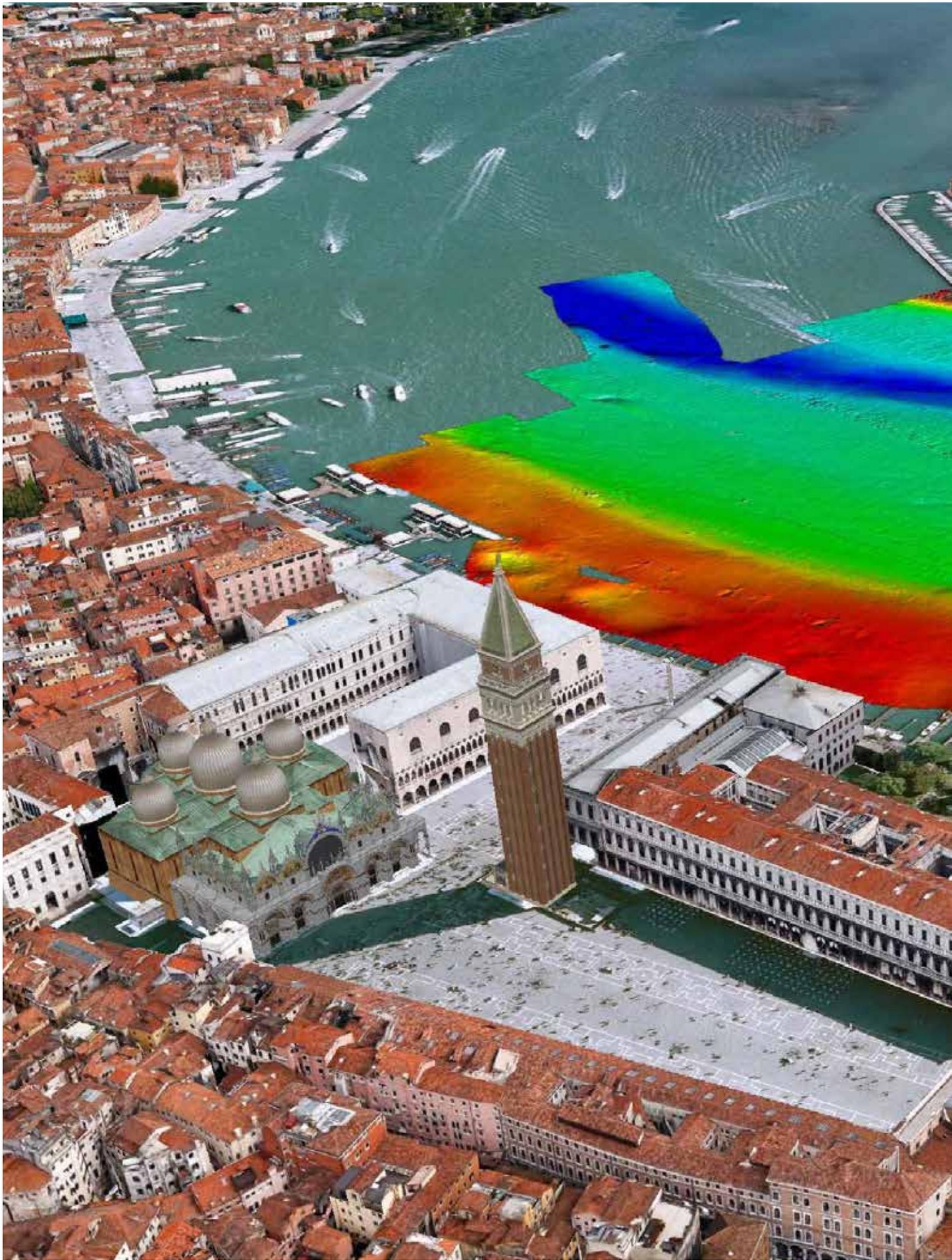
多波束声纳测绘是指通过固定在船体上的仪器向海底发射声波进行测绘，这一领域最新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海底地图测绘的精度，使得以前获得的数据都显得过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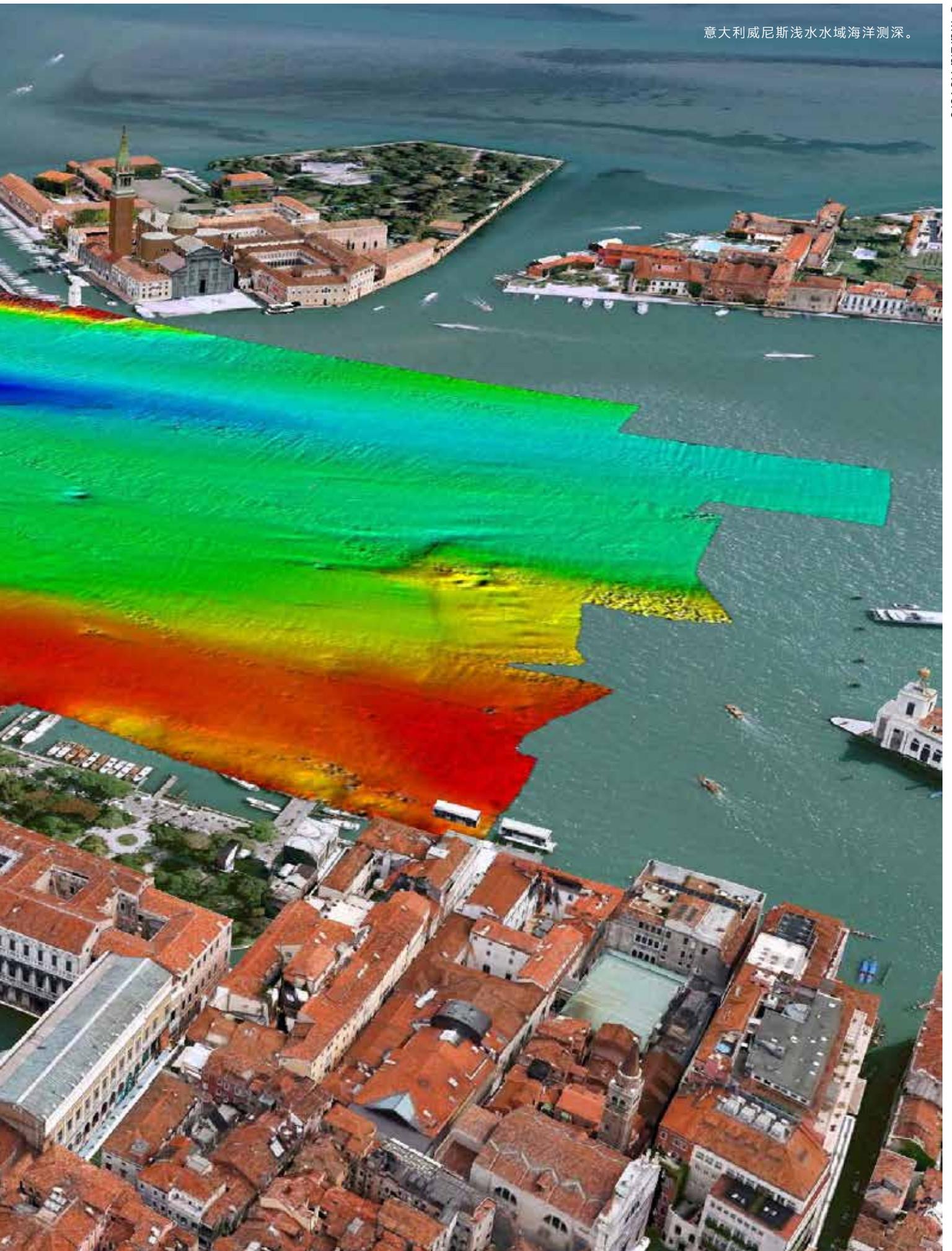
而那些在测深数据不足时得出的结论也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检验和修正。在北极地区利用多波束技术测绘过的区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1%，也就是说仍有大片区域需要利用这种技术进行测绘，从而确保这一地区所有与海洋相关的活动都可以充分受益。而且自六七十年代首次使用多波束技术测绘以来，这一技术的成本已经大幅降低，成为了一种更经济的选择。

同步发展起来的还有卫星大地测量学，也就是重力地图测绘等技术，这种技术是通过计算重力场的异常来更准确地发现海底的山峰和谷地。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时间、投资和协调，特别是科学界有责任向公众和投资机构解释清楚为什么海洋测深学这门研究海洋深度及海底地形的学科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这方面现在已经取得进展：2016年6月在摩纳哥举办的未来海底地图绘制论坛上，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主席笹川阳平宣布：计划到2030年完成整个海洋海底地图的绘制工作。日本基金会是日本最大的私募基金，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支持解决重大海洋问题。▶







这一计划将由基金会长期支持的大洋地势图项目（GEBCO）完成，这个项目是国际航道测量组织（IH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开展的。

海洋测深的意义？

要解释为什么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绘制海洋地图并不难。对于人类来说，比起地球或宇宙中其他星球上的任何地区，海洋都至少是同样的迷人和富有挑战性，而海洋的探索又带来了无数造福于人类的发现：根据过去的经验，海洋探险一直都有各种神奇的有益发现，今后海洋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另外就是，海洋地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要比火星表面直接的多。

海洋测深无疑对航海及海岸线的管理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对于深水循环、潮汐、海啸预警、海洋底层冷水上涌、渔业资源、波浪运动、沉积物的运送、环境变化、坡地稳定性、古海洋学、以及平台、电缆、管道、离岸风车发电机的选址、废物处理、采矿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来说，海洋测深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最理所当然的理由应该是：我们对海底的了解越清楚，就越能有效地管理海洋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高产的渔业发展；海洋测深对于理解海洋生命的深水栖息地至关重要；对海底有更充分的了解也有利于发展更安全高效的采矿业。

但是绘制海底地图的意义远不止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以海啸研究为例，如果科学家对海底的地形轮廓和海水深度有更清晰的了解，那么对因海底地震而引起的大规模水体

运动就可以做出更准确的预警。模拟海啸传播不仅需要测量海洋深度，还需要对海岸附近区域进行高分辨率的测绘，这样我们才能全面理解海水是怎样从深处向浅处运动的，以及这种水体运动将对海岸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虽然更好的海底测绘并不能提高我们预测海啸发生时间的能力，因为海啸是由海底地震引发的，但却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预测海啸形成后的行进路线和海啸的大概强度。

提升对气候变化的了解

在跟踪和预测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长期环境变化方面，海底地图绘制也是一个重要工具。我们知道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洋已经变得更暖，洋流运动已经出现变化，虽然所有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一切正在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由此造成的影响。

世界上的大部分冰川分布于格陵兰峡湾和南极地区，在那里开展的工作极好地证明了更完善海洋测深知识带来的好处。我们已经测量到、并且可以看到较暖洋流对格陵兰峡湾及南极冰盖外围冰川的影响：冰川变薄、大面积裂冰（即部分冰盖的脱离）、大规模冰层断裂以及冰川的消退。这类情况在格陵兰西部的雅各布港或者南极西部的松岛湾尤其明显。

这些情况导致从冰盖及冰川流出的冰流进一步加速，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但海平面上升的规模和速度却很难预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各方因素，包括冰川融化的速度，以便做出更准

确的预测。

能够帮助我们测量海槛深度、了解流向冰川或流到冰盖以下的深水暖流流入点的正是海洋测深工作，遗憾的是目前对这些区域所做的测绘都非常粗糙。

一些峡湾基本上从来没有开展过海洋测深工作，而冰盖覆盖之下区域的数据则主要来自智能水下机器人零散进行的试验性探测，改善这一区域的海底测绘将让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这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尽管提高海洋测深数据质量的意义重大，但是很显然，要想测绘辽阔的海洋区域，科学界、航海机构与产业之间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已退休的前海军少将谷伸自 2013 年 10 月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与国际航道测量组织联合设立的大洋地势图项目指导委员会主席，此前他已在海洋地势图项目指导委员会工作了 24 余年，是日本政府内阁秘书处负责海洋政策、可再生能源、海洋探测与监控、数据管理、海产养殖厂登记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扩展大陆架事务的内阁顾问。



2013年拉维加在格陵兰海远航时在“瑞典探险者”号上安装高分辨率多波束声纳。

为庆祝世界海洋日(6月8日)联合国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大会将于2017年6月5日至9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

从“圣经陈列柜”到真正的“书柜”

科纳克里 2017年世界图书之都

库曼提奥·泽纳布·迪亚洛
Koumanthio Zeinab Diallo

从大城市到小村庄，一条消息飞快地在几内亚传遍了各个角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召开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上，科纳克里当选2017年的世界图书之都。这座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将成为世界上第17个图书之都，而在非洲，它则是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这则新闻被媒体和社区电台广泛报道后，受到了普遍的热烈的欢迎——尽管有人觉得在极端贫困的几内亚，文化和书籍不是什么优先事项。

但大部分人还是把这次当选看作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几内亚文化的机会，有些甚至希望这次世界图书都评选活动会给当地吸引来大量游客，由此延伸出的各种活动肯定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对于那些纯粹的文学爱好者而言，这个机会可以给予书籍和文化应有的尊重，一些像自传体小说《黑色的孩子》(*L'enfant noir*)的作者卡马拉·拉耶(Camara Laye, 1921—1980)、作家、作曲家、和“非洲芭蕾”歌舞团创始人凯塔·福代巴(Keita Fodéba, 1921—1969)这样的艺术家将会得到重点宣传。几内亚的出版商们则认为这是一个宣传推广自己的图书、结识其他出版商和编辑以及发现新作者的好机会。

从作家、出版商、书商、印刷商到学者、记者和学生，每一个自认为与图书的世界有关系的人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力图让这个为期一年的活动圆满成功。201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在几内亚的四个地区开展了推动制定几内亚文化政策的地区日活动，活动中几内亚文化、体育和历史遗产部部长亲自出马，确保世界图书之都活动成为整个活动的宣传焦点。

负责推广图书和阅读的机构都已经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在拉贝大区，文化督察部与福塔博物馆和几内亚笔会中心展开合作，推广图书和阅读，这个笔会中心已经组建了四十个配有乡村图书馆的学校俱乐部。

几内亚的第二大城市拉贝不仅聚居着大批的作家、记者，还有数量众多的读书俱乐部和图书馆。在这里，可供活动聚会的地点已经确认，还一直有人建议将某些活动从首都科纳克里迁到拉贝，如本地区作家名录发布会、几内亚笔会中心新建的四个学校俱乐部的落成典礼、在福塔博物馆大会议厅举办《福塔奇迹》摄影展等，在各个大学和中学也将举办关于图书和阅读的讲座。

在科纳克里，到处都在张贴关于图书之都的海报，活动的手册也被分发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城中各区、甚至邻近城镇都被指定设立多媒体图书馆和阅览室，毕竟这次重要活动的真正意义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取图书。的确，如果没有书，也没有图书馆的话，培养阅读文化就无从谈起。

世界图书年的活动是为了鼓励识字的人阅读更多的书，推动图书的发行和广泛传播，让学生和民众更容易获取图书，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心享受阅读的乐趣了。谁知道呢，也许最后几内亚的每个地区都会设立起多媒体图书馆和阅览室呢。这样一来我祖母的梦想就终于可以实现了——和她那个年代的很多妇女一样，她一直就想在自己的客厅里摆上装满图书的书柜，不过从里面现在摆的书来看，那还只能算是“圣经陈列柜”。□

库曼提奥·泽纳布·迪亚洛 Koumanthio Zeinab Diallo，几内亚，几内亚作家协会创办会员，“昂帕泰·巴”（A. Hampâte Bâ）文学与艺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她还组建了几内亚笔会中心，同时担任福塔博物馆执行馆长。作品包括剧本和小说以及获奖的短篇小说集和诗集。



内容丰富的计划

与科纳克里世界图书之都相关的活动包括：

- 关于几内亚图书出版业所面临挑战的讨论
- 向公众介绍几内亚作家
- 与几内亚本土及外国作家的见面会
- 外国文学日
- 诗歌、故事、传说及漫画月
- 斯拉姆节
- 致敬作家卡马拉·拉耶 (Laye Camara) 和威廉姆·萨辛 (William Sassine)
- 女性、法语文学及戏剧月

电子版

科纳克里，世界图书之都

<http://www.conakrycapitalemondialedivivre.com>



体育促进和平



© UNESCO / Ashutosh Sharma

这三个印度那格浦尔男孩的微笑证明体育能带来快乐和希望。

自2013年联合国宣布4月6日为“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国际日”以来，我们每年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

体育有利于教育、体能发展和健康生活，这些都早已广为人知。比如在健康方面，我们知道6%的冠心病、7%的II型糖尿病与10%的乳腺癌和结肠癌都是由于缺乏体育锻炼造成的。而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孩子更少出现抽烟、不安全性行为或吸毒等问题。

体育也能促进和平。体育的凝聚力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化和社会的范畴，成为宣扬博爱、团结、非暴力、宽容和正义等理想的强有力工具，它把人们团结在尊重、团队合作、平等、纪律、勤奋、毅力、诚信和公平竞争等普遍价值观的周围。

竞赛、联赛、运动会等——体育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如此多的褒扬和媒体关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体育运动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奢侈享受，而是一项投资。

作为政府间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委员会（CIGEPS）的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那些希望在体育领域开展项目、建立或加强体育教育系统的非政府组织和会员国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帮助，并积极参加反兴奋剂斗争。

这一国际日的设立为本组织提供了一次重申体育重要性的机会，因为体育不仅是一种应当得到尊重的人权，更是一种体现在全球运动竞技场上的和平要素。(fr.unesco.org/sportvalues) □

打击和预防青年激进化

继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10月共同举办“预防网上青年激进化”大会后，魁北克实施了对抗青年激进化的新策略，即通过在互联网上传播“反制信息”来打击网上的煽动性言论。魁北克省政府表示，既然社交媒体是极端主义网络进行思想宣传和招募青年的主要媒介，预防工作也必须利用同样的渠道。

日益普遍的青年激进化现象威胁着世界各地民众的安全。2017年5月，黎巴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朱拜勒市合作举办第二届“预防网上青年激进化”大会，这届大会的主题是“青年与信息通讯技术：预防网络空间暴力极端主义”。届时众多专家、公民社会代表及政府官员将出席这次大会。

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加入了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协助成员国通过加强对话和公民教育制定防止极端主义的战略。教科文组织设计了早期青年教育课程，培养年轻人从小具备独立判断能力，成为积极的变革推动者。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与媒体、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携手，寻求最佳策略预防和应对肆意泛滥于网络空间和街头巷尾的极端化现象。

事实上，仅仅打击极端主义、暴力、激进化、歧视和仇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问题的源头着手，采取措施铲除其滋生的根源——无知和对他人的恐惧，换句话说也就是：防患于未然。□



信息扫盲 点击智慧

猜猜看我们在一天之内总共会点击多少次鼠标？答案是：高达数百万次。点击的目的包括游戏、获取信息、阅读、观看视频、听音乐、分享信息以及维系与他人的关系等，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些资讯会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甚至都无法分辨信息的真伪。

因此，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就意味着必须发展与媒体信息扫盲（MIL）相关的新技能。

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Mil Clicks”计划的原因。计划名称中的 Clicks 是由六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构成的，分别是：

- 批判性思维与创意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 扫盲 **Literacy**
- 跨文化 **Intercultural**
- 公民精神 **Citizenship**
- 知识 **Knowledge** 和
-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传授如何分析信息、确认和寻找信息来源，以及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创意。

教科文组织的这项新倡议目前共有英语、葡语和塞尔维亚语三种版本，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分享建议、知识以及资源，鼓励使用者在

日常互动中获取与媒体和信息扫盲相关的能力。

负责这个项目的专家 Alton Grizzle 表示：“我们希望纳入学习和参与的概念，让每个人都能批判性地、聪明地点击。这项倡议与线上用户为建设和平和促进包容、多样性、平等和言论自由所做的贡献是相辅相成的。”

点击智慧，欢迎加入 Mil Clicks 全球社区！

大熊湖人的 来访

位于加拿大西北地区的萨图生物圈保护区一直是萨图托因人（大熊湖人）的祖居领地，保护区包括地球上最后一块原始北极湖——大熊湖以及它的部分流域。定居在大熊湖西岸的萨图托因人以渔猎和旅游业为生。

没有受到污染的自然环境、健康的渔业和流域内丰富的物种（如北美灰熊、加拿大驯鹿及北美麋鹿等）构成了萨图生物圈保护区独特的生态系统，维持这个生态系统的完整对保护萨图托因人的社区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式教育资源取得新进展

“知识和优质教育的普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4）是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间对话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开放式教育资源（OER）为知识共享和增强能力提供了绝佳契机。那些属于公共领域的、或者版权已经被买断的教科书、课纲、课程、视频和动画等教材可以被合法地使用、分享、复制甚至改编。

近十五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发展开放式教育资源，特别是继 2002 年召开的首届世界开放式教育资源论坛后，又在 2012 年举



© UNESCO / Patrick Ka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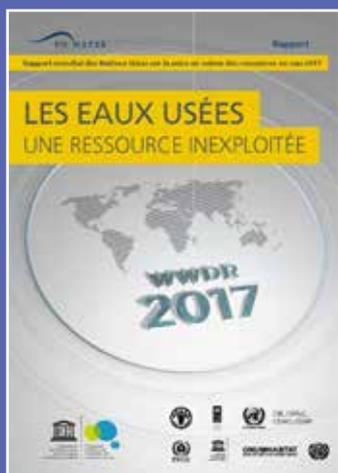
四位萨图托因人代表获邀来到巴黎参与交流活动，就原住民导向型的圣地保护策略、传统生活方式和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等主题畅谈自己的历史，讲述自己的观点。这次活动由加拿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教科文组织当地和本土知识体系计划（UNESCO-LINKS）于 4 月 3 日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一起迎接这个美好的分享时刻吧！□

办了首届世界开放式教育资源大会。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搭建了一个开放式培训平台，为教学和研究提供超过 10,000 项开放资源。

第二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预计于 2017 年 9 月 18 至 20 日召开，会议地点定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为了筹备这次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联邦学习共同体（COL）和斯洛文尼亚政府三方将合作举办共计六场地区咨询会议，分别是：亚洲地区咨询会议（2016 年 12 月，马来西亚）、欧洲地区咨询会议（2017 年 2 月，马耳他）、中东和北非地区咨询会议（2017 年 2 月，卡塔尔）、非洲地区咨询会议（2017 年 3 月，毛里求斯）、美洲地区咨询会议（2017 年 4 月，巴西）和太平洋地区咨询会议（2017 年 5 月，新西兰）。

地区咨询会议的主题是“从承诺到行动：发展开放式教育资源，促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会议宗旨是评估 2012 年第一届世界开放式教育资源大会上所提出建议的实施情况、探索将开放式教育资源纳入国内政策的策略和方法，并鼓励更多的国家和政府以开放版权的形式发行用公共资金编辑的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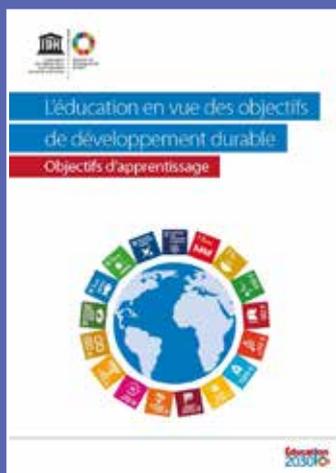


2017 联合国世界 水资源发展报告 废水：未开发的资源

ISBN 978-92-3-100146-8

162页，21公分 x 29.7公分，平装本
售价 45 欧元

每天都有大量的家庭、农业和工业废水被排放到环境中。我们能否将这些废水视为珍贵的资源而非劳民伤财的难题呢？这正是今年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所提倡的思维模式的转变。这份报告指出，经妥善处理的废水能有效满足对于淡水和其他原料需求的增长。当今世界对于淡水的需求不断上升，而过度抽取、污染和气候变化却使得有限的水资源更加紧张。在当今这个循环经济的时代，人们不应忽视改善废水管理所能创造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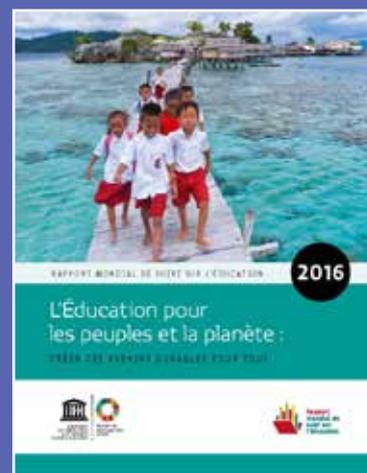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服务的教育 学习目标

ISBN 978-92-3-100209-0

62页，21.0公分 x 29.7公分，平装本
www.unesdoc.unesco.org

为了增强世界的可持续性， 尽力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到的相关问题，人们必须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变革者”。这就需要具备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知识、技能、价值和态度。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更是必不可少，因为它能帮助人们采取以子孙后代利益为重的明智的决定，并且做有利于保全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负责任行为。



2016 全球教育监测 报告 面向人类和地球的教育： 为所有人创造 可持续的未来

ISBN 978-92-3-100167-3

556页，21.5公分 x 28公分，平装本
售价45欧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笔的新版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显示，教育是推动2030议程中所有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力量。报告还指出，教育必须经过重大改革才能发挥其潜力，迎接人类和地球当前面临的挑战。在教育领域推动更大幅度的进展是当务之急。就目前情况来看，全世界将在2042年普及基础教育，在2059年普及初中教育，并在2084年普及高中教育。但这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下的2030年的期限相比，整整慢了半个世纪。

片面的媒体和失望的公众

假新闻

事实与观点之间的模糊界限

摇摇欲坠的职业道德

被弱化的平面媒体

过时的商业模式

后真理时代新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请关注下一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2017年7月)的对话

订阅教科文组织《信使》